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6

19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总第十八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陕西北路386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11,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0.38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关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问题·

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美〕马丁·尼古拉斯（1）
一、新统治阶级的基础 ……（2）
二、"阶级消亡论"解除了苏联的思想武装 ……（8）
三、赫鲁晓夫的崛起 ……（14）
四、修正主义得逞了……（21）
五、赫鲁晓夫巩固了阵脚 ……（28）
六、苏联工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被剥夺了 ……（34）
七、利润挂帅 ……（41）
八、柯西金压制"怠工" ……（48）
九、柯西金篡改列宁的论点 ……（54）
十、推行血汗工资制 ……（60）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读一点匈牙利事件的史料 …… 晓　阳（68）
匈牙利事件 ……〔苏〕B·列昂诺夫（71）
关于匈牙利事件……〔美〕斯蒂芬·D·克尔特茨（86）

·二十年代苏联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一九二七年发生在苏联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92）
反对派反苏维埃的表演……〔苏〕《真理报》（93）
反对派在游行队伍中 ……〔苏〕Я．Р．（97）

·超级大国的没落·

一种唱挽歌的气氛 ……（99）
我们的第三世纪的任务
……〔美〕埃米特·约翰·休斯（101）
开拓者和移民……〔美〕本杰明·夸尔士（109）
美国经验：开国元勋树立的榜样
……〔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116）
独立：新美国的诞生……〔美〕《时代》周刊（124）

• • •

罗马尼亚游记……〔美〕唐纳德·商奈尔（134）
蒙哥马利：阿拉曼战役的传奇式人物
……〔美〕《时代》周刊（149）
俄国式的缓和……〔法〕让-弗朗索瓦·勒韦尔（152）

关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问题

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

〔美〕马丁·尼古拉斯

编者按：《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连载在美国《前卫》周刊上的一组文章。文章力图分析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和原因，可供参考。作者是美国《前卫》周刊的外事编辑。

这一组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一九七六年汇编成书时改成现名。全部文章共二十八篇，本刊选取了后二十一篇，分别在一九七六年第六、第七两期连载。

本组文章由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资料室、辽宁大学经济系苏联经济组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翻译室合译。

一、新统治阶级的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

苏联的经历清楚地表明：旧社会的残滓余孽（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资产阶级和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耐普曼① 以及富农），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发生的剧变中并未起主导作用。虽然这批仍然留居在苏联国内的残滓余孽，在五十年代中期还很年轻力壮，有可能在政治上发生作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出身是取得党籍的障碍，使他们绝对没有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资格。

一九五九年，美国金融寡头兼外交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在他写的一本回忆苏联旅游的书中讥讽地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苏联会见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书中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

"'我原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工人。起初是个放羊娃，后来被提升为放牛娃，最后在矿上找到了工作，一直干到十月革命。'"

哈里曼继续写道："同副总理科兹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一同参加谈话的副总理米高扬，好象生怕别人超过自己似地插嘴说：'我是皮匠的儿子。'科兹洛夫说：'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甚至在会谈中一直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也大声说：'我是贫民的儿子。'我对他们说，你们都象那些发表竞选演说的美国政治家那

---

① 耐普曼，俄语 НЭПМАН 的音译。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商人和投机者。——译者

样自夸出身清贫……”①

简而言之，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的篡政夺权不是属于被剥夺的老资产阶级的复辟，而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崛起。但是，这个新资产阶级是从哪里产生的，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农业，特别是集体农庄。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 虽然苏联集体农庄已不再具有列宁所说的这种小生产的特征，但是仍然存在着足以构成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土壤。

不仅自留地是个问题。更成问题的是集体农庄财产的所有制形式。从农庄庄员使用的全部土地和主要农业机械（拖拉机、康拜因等）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这个意义上讲，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财产。但是，除了这些主要的和某些次要的限制（诸如物价管制）之外，每一集体农庄对其它农庄和对国家的关系很象一个牟利的私营企业。尽管一个集体农庄可以组织数千人从事生产，但是，同国营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计划的整体性相比，集体农庄生产仍然是小规模的、而且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生产。

在斯大林最后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对集体农庄以及和这种形式有关的商品交换关系，明确地提出

---

① 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俄国和平吗?》，1959年纽约版，第17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1页。

了警告："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①

赫鲁晓夫等待时机

我们从以后发生的事件中得知：苏联国内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同意斯大林的这种估计。他们也不同意斯大林反对把机器和拖拉机出售给集体农庄所作出的禁令。斯大林写道，这种建议必然会走向"复活资本主义"。②（几年以后，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批判过的许多事情付诸实施，其中恰有这项建议。）然而，无名小卒萨宁娜和温什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这一建议时，赫鲁晓夫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都没有站出来表示赞成，这是意味深长的。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组织过公开的讨论，全党都奉命参加，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二年已经同意萨宁娜和温什尔一伙的意见，他也会秘而不宣。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伙热烈地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可是时隔不久，就反其道而行之。这类手法是苏联新资产阶级的特征。

农业的发展，虽然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及以后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五十年代中期政治事变的幕后领导力量看来并不来自农业方面——这个最明显和公认的资本主义温床。在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斯大林逝世后掌权的绝大多数主要的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例如赫鲁晓夫和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有着侧重于工程或工业方面的党务工作的经历。

斯大林时代削弱了经理的权力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经理，处于非常矛盾的地位。他们的责任重大，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理，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要小得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企业经理（或厂长）是个人负责制，要负责组织人事、技术和会计等方面的生产过程。按照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主张的"一长制"管理原则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拟订的其它措施，企业管理的责任集中在个人身上。这个原则旨在克服生产混乱、生产中断和无人负责等现象。在工人们自发地没收工厂和幼稚地"自己管理"等活动的初期，这些现象简直是层出不穷。后来，"一长制"原则被保留了下来，甚至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强。在"一长制"下，经理的责任事实上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经理的责任更为繁重，因为苏联的经理在技术上和在法律上都受经济计划的制约。经济计划中相当详细地规定了生产的品种和生产的时间。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① 这就是说，经理不完成计划就是犯法，可以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如果发现犯有故意破坏的罪行，就可以作为破坏分子处以死刑。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0页。

尽管苏联经理身负繁重而严格的责任，但是，他们对工人的权力通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经理小得多了。他们过去确有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初农民大批流入城市的工业化运动时期，他们有权分配工人干不同工作，有权用罚款来惩治迟到和旷工的工人，或用别的办法来"办厂"。但是，他们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经理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即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苏联经理不能以失业和饥饿来威胁工人。

这就具体说明，苏联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它的价格（工资）不再由于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的存在而下降，而且商品买主的不可剥夺的拒购权力（拒雇或解雇权）都不再为人们所承认了。除了作战时期之外，工人可以自由退职；但是，假如经理不能证明工人触犯刑法，他就不能解雇工人。经理既然没有控制工人的权力，也就软弱无力。

工人的权力受到保护

此外，工人们有多种办法来对付滥用权力的经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玛丽·麦考利写道：苏联设有特别法庭审理工业争端。在这种法庭上，只有工人有权申诉。经理不得作为原告，只能在处于被告的情况下出庭。① 甚至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工人也有办法使讨厌的经理知道该谁当家作主。办法之一是生产会议。资产阶级学者大卫·格拉尼克在他的《红色经理》一书中描述道：

"工厂的管理工作是在受到严格的思想限制和具体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还要力图避免工人的批评。一个工厂经理……暗示，生产会议对他来说是一场真正的严峻考验。但问到工人

① 玛丽·麦考利：《苏联劳工争端》，1969年牛津版，第54—55页。

是否敢于公开批评时，他说，'任何压抑批评的经理将受到严厉惩罚。不仅会被撤职，而且会受审判。'"①

经理们占居上风

从长期来看，经理的职责重大而权力甚小，这不是合理的现象。合理的改进办法，应该是把经理的职责逐渐转交给工人，以便使经理的职责和他们的权力相称。但是，由于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经理们就先发制人了。他们一方面把工人的权力大部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又推卸经济计划强加给他们的责任。经理们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出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动机。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地受到制止和镇压，但是，它们的根源未被消除。斯大林逝世之后，新的领导一旦牢固地控制了党，经理们便在报纸上发泄他们积郁已久的、权微而任重的不满情绪。随后，包藏在这种不满情绪中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① 大卫·格拉尼克：《红色经理》，1960年纽约版，第230页。

二、“阶级消亡论”解除了苏联的思想武装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外表上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是空前的强大、巩固，可是，在这坚实的外表里面，却隐藏着种种蜕变，使得这个社会主义的堡垒，随着历史的变迁，不知不觉地被一小撮挥舞反马列主义纲领的反革命头目占领了。

要了解这个转变是怎样得逞的，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前例可以凭借。能够透露特殊事件的主要文件大部分弄不到手，因为许多事情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可是，只要仔细地注意一下发展的结果，就可以识别出导致这一历史倒退的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在党和政府最上层里的反映。前面说过，集体农庄中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狭隘的、本位的、唯利是图的和无政府行为的客观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工业生产上，个别经理和工程师拥有过多的职责，使得他们产生了某种优越感，并且要想抓权。在工、农这两个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里，基层领导不得不把一只脚趾，甚至是一只脚，站在资本主义或者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办事。于是，在他们的头脑里，就不能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产生更为向往资本主义、而不是向往共产主义的愿望。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这种想法，如果是在最露骨的形式上出现，无疑地会很快受到抑制；如果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对于许多人就有

重大影响，而且可以预料得到的是，这样的想法在少数人的头脑里，会成为完全处于主导地位的推动力量。

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残余

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不仅带来了许多旧思想，而且还保留了一些旧土壤。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必然要受到马克思称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工资制度的不平等，加上苏联常有的个人额外津贴和奖金，这些都是和苏联工人阶级最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热情和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社会基础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也不可避免地要渗透进党和政府等高级领导机关。在无数的集会、访问和会议之中，苏联各级干部每天都碰头，现实的落后方面和基层的思想，一定会和进步的方面一样同时都反映给上级。集体农庄主席的内心动机和富农没有什么区别，工厂经理渴望控制工人，工程师妄想成为天才，党的中、下级干部想要特权——所有这一切必然迟早要在上级机关找到或形成他们的代表，即既懂得怎样隐瞒、也懂得怎样增进他们的利益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类骗子、野心家、大坏蛋，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的必然产物，正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面（这是主流）必然会产生斯大林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者、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的伟大导师一样。

苏联党和政府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两面派、野心家和机会主义分子。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人总是会不断产生。只要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样的人就会象资

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头那样，想方设法向上爬。揭露和清除一、两个这样的人，并不会使其他野心家沮丧，而只会使得其他人变得更加狡猾。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苏联篡权的第一个原因。

除了这个多少是带有必然性的条件之外，在苏联历史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有一个非必然性的情况。这个情况，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给党里的坏人提供了做坏事的方便，而且更有得逞的机会。

放松了警惕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苏联的党和政府在国内外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显得空前强大。在第二次大战中，苏联先是避开敌人，后将敌人击退，最终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到一九五〇年，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成为一个包括欧亚大片土地和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

在国内，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大发展使生产在较短的时期内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且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复原中特有的失业问题。虽然苏联党和政府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但是他们仍有理由歌颂胜利。他们取得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

历史的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使许多赢得胜利的领导干部产生自满情绪，甚至一些赤胆忠心的干部也感到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享荣华，吃干饭，不做事了。在一九六八年，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曾经叙述过这种不良倾向在斯大林逝世前几年的发展情况：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都是家庭出身好、革命干劲足的干部。他们在革命中，在战斗中，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在反对托洛茨基、'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叛徒的斗争中，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锻炼。他们对于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对于他们制定的正确路线和规范，都深信不疑。

"对于他们说来，党就是一切，党是他们的心、他们的脑、他们的眼。这就是他们保卫党的理由。他们接受了党和伟大领袖的教育。但是，苏联的干部在努力执行党和斯大林的正确路线和规范的同时，起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显的而是逐渐地感染了贪图安逸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和革命发展不相符合的……工作上的成功滋长了自满情绪，因此，苏联的干部开始失去无产阶级的简朴本质，并且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要求在'政治上是合法的'，因为这些人都曾辛勤工作，英勇斗争。他们提升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以后，贪图安逸和自满情绪也逐渐发展起来，而且他们更多地受到官僚主义、智育第一和技术至上的感染……许多干部不象从前那样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比群众强。他们高踞于群众之上，自认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工人阶级高明，而且更具有远见。这些干部把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在苏联群众和工人阶级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同他们个人的威望混淆起来。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瓦解了这些干部的革命意志，也影响党的路线和路线的执行。党的革命的标准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党本身的生命和党的组织以及整个苏联国家的行政却在不断地僵化。"①

总之，苏联党内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出现几个机会主义分子，

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1972年地拉那版，第419—421页。

而且还由于革命警惕性不强，以致于不能揭露和打倒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忠诚的无产阶级干部没有识破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干部自己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可是，如果不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在二十多年前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理论错误的话，仅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还不能保证修正主义者篡权阴谋得逞。斯大林的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年公开提出的一个论点：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一直认为，苏联"……没有阶级冲突……"。① 所以，苏联社会内部再没有产生资产阶级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复辟的危险只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即使在他最后的一本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斯大林只是作了这样的纠正："……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② 但他仍然坚持并无真正的危险，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③

由于斯大林的理论有这个大缺陷，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领导的一系列教育运动、纯洁文化的措施和全党范围的理论讨论，都不足以鼓励和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能使自满的人有所警觉。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缺乏生气，运动的矛头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斯大林的理论发展跟不上实际运动的需要，而且也没有给运动以革命的指导。这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够得逞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5页。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如果在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中，有一个能同斯大林的德才相当的领袖，上述三个原因大概还不足以使修正主义得逞。因为只要斯大林在世，苏联社会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势力及其在党和政府内的代理人就不敢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即使他们贸然行动，也只是取得很小的进展。他们可能暗暗地做些小动作来推行他们的纲领，也许要求并且获得一两种微不足道的特权，还会不时采取谨慎的试探行动，但是，这里有严格的限制。在理论上，斯大林虽然不能或不愿意承认野心勃勃的新生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在实践上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打击资产阶级的纲领及其炮制者。

我们试举一例来看：一九四九年初，很有权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Н·А·沃兹涅先斯基明显地别出心裁，对计划机构作了温和而又重大的改组，并且提高了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这同后来赫鲁晓夫所走的路线一样，扩大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并没有得逞。他被立即逮捕，被判为破坏者而遭枪决。① 和沃兹涅先斯基具有相似动机而落得同样下场的也不止一个。

当然，这种限制资产阶级野心的办法终究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只要斯大林还在世，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新生资产阶级和走资派不会不了解，他们是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地位，有一些微薄的物质利益，他们也可能因为工作有些成绩，在节日受到党的表扬，但是只要他们走错一步，就会完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政权。

---

① 参看费尔克：《苏联经济问题论战》，1966年剑桥版；凯叟：《经互会》，1967年牛津第2版。

三、赫鲁晓夫的崛起

一九五二年十月下旬，斯大林在逝世前的几个月，建议把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增加一倍以上，以便从中挑选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的提议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提出的党的主席团和新书记处的名单全被中央委员会接受。这一行动使得赫鲁晓夫很紧张，如果他的那本所谓《回忆录》在这一点上是可以相信的话。事前没有和他商量。斯大林是否准备清除他呢？

不管斯大林的意图如何，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意图。在他逝世的时候，主席团和书记处大约有三十六人，这些人实际上都够资格成为他的继承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可能是优秀的马列主义者，但是，显然没有一个（即使是最优秀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具有斯大林那样的杰出的才能、充沛的精力和崇高的威望。

党内滋长着自满情绪和机会主义，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断潜移默化地腐蚀社会主义的结构，破坏社会主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局势。此人就是斯大林。但他却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了。

全世界的亿万劳动人民都哀悼他的逝世，而苏联工人悲痛最深。他领导苏联的党和国家三十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他和"左"、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作了极其有力的斗争，这些人都想把苏维埃政权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领导的合作化和工业化运动为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他有错误和局限性，他确实不愧为列宁的接班

人。他保卫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有他作为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从混乱、落后和孤立之中走向建设一个处于日益壮大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心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逝世以后，尽管篡权的阴险小丑对他横加污蔑，诽谤之辞堆积如山，但是莫洛托夫在三月九日为斯大林举行的红场葬礼上的讲话，仍然表达了马列主义者的评价：

“斯大林的不朽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苏维埃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心中。

“斯大林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永垂不朽！”

继承的危机

在斯大林的遗体入殓之前，那些可能继承他职位的人中就爆发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的深远和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变化相同，但是，它却是要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把苏联的历史进程引向相反的政治方向：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场斗争本质上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开始却似乎是以各领导人之间争权的形式出现。

本文只能概括地叙述这次非常复杂而又曲折的权力斗争的经过。这个斗争从斯大林逝世开始，到“反党集团”的失败和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鲁晓夫权力的巩固而结束。

从政治上的演变来看，这些事件的大致过程是：最初两年，赫鲁晓夫以斯大林的继承人和马列主义的捍卫者自居，篡夺权力和扩大影响。但是，当他在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突然公开反对斯大林时，他的权力急剧下降。只是由于空军和陆军参谋部的干预，他才没有在一九五七年被推翻掉。

这场斗争中的主要事件有：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贝利亚事件；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期间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斗争；一九五六年召开苏共"二十大"和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发动不流血的政变。

贝利亚的作用

斯大林逝世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转折点里最不清楚的一件。三月六日凌晨，莫斯科卫戍司令员突然被捕，他的部队被贝利亚指挥的准军事性的国家安全警察部队软禁在营房里。贝利亚的部队完全控制了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那天晚上，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比舍夫将军——他可能是唯一知道斯大林有关继承意图的人——秘密地失踪了，以后就杳无音讯。三月六日晚上宣布，一九五二年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党的十人书记处中的五位以及主席团三十六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二十二人均被解职。在苏联政府的五十二个部长中，有二十七人下台。在公布的新领导人中，贝利亚在部长会议里，骤然上升到第一副主席的地位，仅次于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得到了最高的职位，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仅在其次。朱可夫元帅原是默默无闻的人物，却一跃而为显要的国防部副部长。

至于这些突然的决定是怎样作出的，没有可靠的文件或者解释。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克兰克肖写道：贝利亚的部队"在完成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不言而喻，摧毁了斯大林的主席团"。① 不管事实怎样，到了那年六月，剩下的领导人决定要

①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第188页。

除掉贝利亚。

根据赫鲁晓夫的所谓《回忆录》说，主席团的成员把贝利亚召来，说他是混入党内的野心家。电钮一按，门开了，朱可夫元帅从隔壁房间走进来说："举起手来"，于是逮捕了贝利亚。① 后来，贝利亚被枪决了。国家安全警察就被赫鲁晓夫的亲信控制了。

和马林科夫的斗争

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以指定继承人出现，身兼党政两方面的最高职位。可是，两个星期以后，他辞掉党的最高领导职位，让赫鲁晓夫实际上控制了党的组织。八月份，马林科夫仍旧是部长会议主席，提出他的"新方针"。他向苏联人民许诺，要迅速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事实上，他是以"家家有鸡吃"作为施政纲领的。

这个纲领有两大缺点：（1）以牺牲重工业和国防生产为代价来发展轻工业；（2）事前没有得到党的批准就擅自公布了纲领。赫鲁晓夫巧妙地抓住了这两个缺点。他以拥护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传统的姿态，主张要加强军事上的准备，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冷战。他主张共产党要领导政府各部，因为政府各部是马林科夫的权力基础。一九五五年二月，马林科夫的各个部公开执行和党不同的方针。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主张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而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则针锋相对地表示主张重工业领先。就这样，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在这次斗争中，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及其支持者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1970年纽约版，第364—366页。

赫鲁晓夫借保卫斯大林路线、反对马林科夫的右倾路线之名击败了马林科夫。他乘胜撤销许多支持马林科夫的人的党内职务，并且把自己的人安插在这些职位上。这样，赫鲁晓夫的地位巩固了，就着手对付莫洛托夫和改变外交政策了。

在这一方面，情况就两样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上从来没有执行"新路线"，他严格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坦然忍受了赫鲁晓夫的蓄意侮辱，例如没有让他参加一九五五年到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国事访问，以及一九五五年冬天在四大国日内瓦会谈中贬低他的地位等等。

要对付这位毫不宽容的老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政治思想：执行"新路线"的恰恰是赫鲁晓夫自己，而不是莫洛托夫。首先，赫鲁晓夫不顾莫洛托夫的强烈反对，于一九五五年五月访问了南斯拉夫，吹捧铁托的资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步是恭维仇恨中国革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而且在一九五五年底日内瓦四国最高级会议结束之后，他马上就抛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理论。

但是，到这时为止，赫鲁晓夫还没有公开说过反对斯大林的话。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前做了"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出笼经过至今仍然是一件使人猜测不清的谜。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分（他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正式担任此职）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里，还是对斯大林歌功颂德。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述，在大会期间，他向主席团建议，谈谈“斯大林的滥用职权”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表示反对。会上引起一场剧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最后提出了最后通牒：“让我提醒你们，主席团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向大会发言，有权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哪怕他的观点同总结报告里所定的路线不合。”① 其他的人只好软了下来。这样一来，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秘密会议，让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反动的出版家小赫尔斯特说：“任何反共作家论述斯大林的话都比不上那天晚上他的继承人对他的攻击。”② 主席团的成员不大可能事前都看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或者知道他的全部意图。

新“理论”出笼

这颗炸弹爆炸后，党内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混乱压倒了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小心谨慎地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些新的和平经的讨论。

所有和斯大林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党员，都突然被控参与“不可告人的罪恶与罪行”。赫鲁晓夫由于掌握了秘密警察的档案，就有选择地抛了“材料”，或者威胁要抛“材料”，使他的对手因有牵连而犯罪。至于一个干部是拥护马列主义，还是拥护“和平过渡”，党是走无产阶级的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这都没有关系。主要的问题要看这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或者三十年代的其他时期，是否曾经参与肃反工作，对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1970年纽约版，第381页。

② 小赫尔斯特：《有问必答——我们和赫鲁晓夫的奇遇》，1966年纽约版，第85页。

待肃反对象是否过火。首要的问题不是政治路线而是道德上的过错，政治斗争弄成了道德游戏；因此，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仿效赫鲁晓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已经逝世的斯大林身上。

可是，这个办法并不十分成功。大多数苏共干部不是那样轻易就被他吓倒的。一九五六年二月以后，正当这个"秘密报告"传遍了社会主义阵营，传遍了世界各地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地位却日益动摇。他的新路线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底，赫鲁晓夫被迫全面退却，不得不发表些拥护斯大林的演说。一九五七年初，他差一点完蛋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主席团要免除他的党内领导职务。但是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在六月二十二日出来营救赫鲁晓夫。

四、修正主义得逞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二十大闭幕后的第十六个月，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所掀起的风暴达到了最高潮。党内赫鲁晓夫路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终于摊牌了。

赫鲁晓夫从党的领导职位上被赶下来，权力被剥夺了，然而，在两个星期之内他又打败了对手，重新上台。这次摊牌的经过以及苏联军事集团所起的作用，有力地说明了当今苏联社会的性质。

实际上，这次斗争是在苏联最高阶层的极少数人之间进行的。显然，赫鲁晓夫的对手从未想到要把争论内容向苏联人民公布，这无疑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而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则千方百计地把苏联人民蒙在鼓里。

甚至绝大多数党员起初也都是不知道的。根据泄漏出来的"秘密报告"抄本描述，一九五六年二月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听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长达两万字的漫骂以后，特别会议就在"激动异常，长时间鼓掌声，全场起立中胜利闭幕"。但是，如果这一描述是确实可靠的话，那就说明，这样的热情在党的最高阶层比在下面的强烈，因为，决定不让普通党员知道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这在党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会以后，党报公开发表的却是一个似乎没有恶毒攻击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赫鲁晓夫长篇报告的最后几段；其中的论点是：要求结束"个人崇拜"，要求审查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看法"。这是一个措词十分温和的文件，丝毫看不出赫鲁晓夫曾

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恶毒漫骂斯大林的任何迹象。文件中甚至连斯大林的名字都没有提起。

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在苏联仅刊印了六千份，全部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① 当时，苏共全党有将近八百万党员。可见，只有极少数党员（不到千分之一）拿到这个文件。但就是这少数人也足以使毒液滴入党的动脉，产生没完没了、逐渐升级的谣言和吓人的传说，引起猜疑和混乱，破坏团结和毒化气氛。尽管如此，但对过去受党多年教育、尊敬和保卫斯大林的大多数干部来说，这个文件还不足以改变他们对斯大林的看法。

当时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也拿到了这份报告。他自己在军事上的一些看法，大部分反映在这个文件里了。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红军的高级司令员之一，指挥红军打了好多次战果辉煌的胜仗。可是，胜利使他变得骄傲自负起来了，因此，斯大林在战后把他降到次要的职位。朱可夫怀恨在心，就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一九五三年，朱可夫被提升为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当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当上了国防部长。他是苏联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职业军人。同时，赫鲁晓夫又乘机任命了十几个新的元帅。

朱可夫得势

尽管赫鲁晓夫把自己装扮成拥护党领导一切的卫道士，但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对朱可夫元帅反党的嚣张气焰，予以鼓励和赞赏。在苏共二十大开幕前一星期，朱可夫在陆军的报刊上公开提出，要党不再指挥将军们的行动："在地方党的会议上批

① 巴洛齐-豪尔瓦斯：《赫鲁晓夫：一个独裁者的形成》，1960 年波士顿版，第211页。

评指挥员的工作，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加强指挥员的权威，支持严格的军官和将军。”①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当党代会正式会议结束、赫鲁晓夫要作“秘密报告”的前夕，朱可夫表示了相似的思想感情。他在莫斯科高级将领纪念红军成立三十八周年会上的一次讲话里，他的反斯大林的倾向就更加清楚了。一周以后，他就被提升为党中央主席团的候补委员。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破格的晋升。

赫鲁晓夫后来说，朱可夫有波拿巴主义者的野心，而且计划“在我国进行一次南美式的军事政变”，② 这并非是不可置信的。朱可夫把专业技术知识置于政治之上，显然对政权怀有个人的野心；但是这只是到后来才使赫鲁晓夫不安，而在当时赫鲁晓夫的阴谋诡计中，朱可夫还是很有用处的。

我们很难确实地了解到：在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后的几个月里，苏联的普通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究竟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据苏联国内的一个地下马列主义小组（七十年代初期被镇压下去以前曾有过短期活动）说：广大的党员“要求中央委员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斯大林的贡献作一个客观的评价。党员们坚持这个要求，使苏共的机会主义头子不得不对许多党员进行攻击和迫害，不得不解散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党组织”。③

至于党外的群众，甚至连上述的迹象也无法收集。但是，根据这一时期群众得到的一些经济上的小恩小惠来看（这时，赫鲁晓夫任意采用了那个被他谴责过的所谓马林科夫“新路线”），群众一定有过某种程度的不满。巴洛齐-豪尔瓦斯曾经谈到，苏联

---

① 巴洛齐-豪尔瓦斯：《赫鲁晓夫：一个独裁者的形成》，1960年波士顿版，第190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1970年纽约版，第14页。

③ 《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布）的纲领和原则》，1967年纽约版，第4页。

群众相当的不安，自发进行示威和罢工，尽管这些活动不一定都具有进步的意义。过去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被监禁的许多人，包括各式各样的铁杆反动分子，当赫鲁晓夫的大赦令颁布后，被释放出来，又进行猖獗的活动。①

赫鲁晓夫变得孤立了

几乎使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些事件，不是来自苏联内部，而是来自东欧的苏联盟国。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爆发了波兰工人起义和匈牙利的未遂反革命事件，这两次事件是由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路线和高唱"和平共处"经而引起的。他处理这些事件时又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到了一九五六年秋末，他已陷入重重困境，正如克兰克肖所说的，"大有被推翻的危险"②。巴洛齐-豪尔瓦斯报道说，"他的地位极不稳固"。③那年冬天，他很少公开露面；而且即使发言，也只是再度伪装为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把斯大林赞扬一番。④似乎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在苏共二十大定下的基调。

为了摆脱在社会舆论上和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极端孤立的处境，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发动了一次最大胆的反攻计划（如果没有朱可夫撑腰的话，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他向那个早已安插了自己许多亲信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分散管理经济"的激进计划。其中之一是把国营的机器和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这样，就使集体农庄具有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独有的特点。在工业方面，这个计划一下子就把列宁和斯大林多年辛勤

① 巴洛齐-豪尔瓦斯：《赫鲁晓夫：一个独裁者的形成》，1960年波士顿版，第219页。

②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第239页。

③ 同①，第246页。

④ 同②，第243页。

建立起来的一些中央经济计划部都取消了。这些部的职权全部移交给一百多个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中央则仅保留一点徒有其名的监督权。

这种做法，使得在其他方面忠于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赞成。经过几个星期的斗争，赫鲁晓夫所能得到的结果是把这个建议在报刊上公布出来，让群众讨论。这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事。或许，赫鲁晓夫知道这已是他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就象走江湖的那样，周游全国，寻求支持。据克兰克肖说，赫鲁晓夫在这次活动中，“对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关键人物说，只要莫斯科的官僚机构废除了，就可以得到梦想不到的利益，职权会扩大，而且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都可以被提升”。①

党中央主席团里反对赫鲁晓夫的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还在主席团里任职），对于赫鲁晓夫的这项建议的争端默不作声。他们也许指望不经过公开斗争就取得胜利。巴洛齐-豪尔瓦斯写道：“这个计划显然不受人们的欢迎，即使连赫鲁晓夫控制的党刊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文章。”② 但是，这个计划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朱可夫元帅，他借口为了“国家安全”支持这个计划。据克兰克肖推测，朱可夫是因为相信地方分权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不会象权力集中的中央各部那样反对陆军。③

准 备 摊 牌

赫鲁晓夫提出的分散管理经济的计划，不管有意或无意，只

---

①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第247页。

② 巴洛齐-豪尔瓦斯：《赫鲁晓夫：一个独裁者的形成》，1960年波士顿版，第216页。

③ 同①，第248页。

能导致最后的摊牌。因为，这个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苏联新资产阶级在那个发展阶段的一切"最高要求"；另方面，又使马列主义者和一切同中央经济部门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人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

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决定把赫鲁晓夫从芬兰召回，参加根据党章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按照克兰克肖的描述，赫鲁晓夫一回到莫斯科，"发现自己孤立了。他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主席团以绝大多数票表决，解除他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断然拒绝辞职，直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的决议后，他才下台。布尔加宁大声喊道：'我们是七票，你们才四票。'赫鲁晓夫反驳道：'算术里二加二当然等于四。但是政治不是算术，它们多少有些不同。'"①

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者约翰·多恩伯格还提供了一些细节：主席团大多数成员"指责赫鲁晓夫执行机会主义和托派的政策"。② 不管具体说的是什么，赫鲁晓夫还是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于是，主席团在议事程序问题上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按照克兰克肖的报道（在这一点上，多恩伯格叙述的不够详细，虽然在基本情节上，所有报道都是一致的），在主席团争吵激烈的时候，赫鲁晓夫一派采取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行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得到朱可夫和空军运输机的帮助，他们从遥远的省份赶到莫斯科，而那些已经在莫斯科的赫鲁晓夫支持者则故意用冗长的发言来妨碍议程的进行，直到大多数的赫鲁晓夫支持者到来……

克兰克肖继续写道："根据波兰报纸的报道，朱可夫更进一步直接攻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指责他们在肃反

①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第247页。

② 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1974年纽约版，第152页。

时期犯了错误，并说如果他们再不检点，他就要公布那一时期的文件来做证据。"①

朱可夫为了赫鲁晓夫的利益，不仅及时地把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运送到莫斯科，而且还威胁要公布文件。从这里可看出朱可夫干预的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朱可夫身为国防部长，是代表整个苏联武装力量发言的。他的发言有超乎寻常的份量。他的话里含有明显的警告：武装部队不会支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主持的政府。

摊牌结束后，莫洛托夫被流放到蒙古做大使。马林科夫到西伯利亚当电站站长。其他的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他们默默无闻了。朱可夫则被提升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以资奖赏。三个月以后，当赫鲁晓夫觉得朱可夫没有用场的时候，就弄了个圈套，把朱可夫赶出主席团。

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支持者纷纷被赶出领导岗位，或者根本就被赶出党政之外。赫鲁晓夫及其一伙把他们的党羽安插在这些岗位上。斗争结束了，赫鲁晓夫的计划获得了胜利。

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最后摊牌中，敌对的双方没有流血，但从根本上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是由于军人干预才失去权力的。这次夺权没有流血，而且按照党章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如此，它实质上是一次保证赫鲁晓夫取得胜利的右派军人政变。赫鲁晓夫的权力毫无疑义地是用枪杆子得来的，只不过它们不是革命战士和农民手中的枪杆子，而是资产阶级反动军官集团的枪杆子罢了。

①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

五、赫鲁晓夫巩固了阵脚

一九五七年六月的"宫廷"政变，把当时唯一有潜力使苏联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来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赶出了苏联国家的领导机构。

我们今天坐在安乐椅里，说说当年莫洛托夫和他的盟友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失败，那是很容易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应当把这场斗争局限于最高的领导阶层内部。他们应当勇敢地把问题交给群众。一位苏联问题专家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闭幕后的几个月里，"工厂里举行了集会，在这些群情激昂的集会上，工人们甚至斥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成了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① 如果莫洛托夫和他的盟友把斗争同工厂里的风暴结合起来，领导群众一起谴责"新资产阶级"，结局就可能会大不一样。

可是，当我们在事后猜测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忘记莫洛托夫或其他领导人可能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必然遇到和必须击败的，不仅是赫鲁晓夫玩弄的演说和策略花招，而且还须对付国防部长朱可夫指挥的红军力量，更不用说还得对付赫鲁晓夫控制下的国家安全警察了。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也许要冒一场内战的危险。军队会向工人开枪吗？哪些部队会继续效忠于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又有哪些部队会支持莫洛托夫？

谁也不能回答这类问题。然而，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想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产业工人》，1967年纽约版，第11页。

要领导一场群众运动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任何领导人，首先必须考虑的正是这类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要是爆发一场新的内战，对于东欧的盟国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场内战会不会引起象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复辟？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比较具体地考察历史背景时，就会发现几十个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谁要是象坐在安乐椅上的指挥者那样指点莫洛托夫及其盟友"应该如何如何行事"，谁就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嘲弄。

"倒退着走向未来"

如果……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如果"只是推测而已。但是赫鲁晓夫集团一旦在党的最高组织里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所发生的却是历史事实了。在这一方面，克兰克肖说过的一句话是值得重提一下的。他说，赫鲁晓夫"倒退着走向未来"。① 克兰克肖这句话主要是形容赫鲁晓夫的作风，但是更适用于描绘赫鲁晓夫掌权后苏联国家的具体政策和纲领。

正如赫鲁晓夫释放了成千上万个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反革命分子，或给他们恢复了名誉，被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碎了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又被赫鲁晓夫一个一个地重新捡起。这就是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内在逻辑，他不得不如此。因为，除了词藻的修饰之外，赫鲁晓夫的纲领实质上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他的纲领的具体内容都是以往那些当权的或者可能成为领导的人提出过的。这些人的名字和观点，每个苏联公民都可以在斯大林主持编写的那部家喻户晓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① 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一生的境遇》，1966年纽约版，第270页。

简明教程》(赫鲁晓夫首先否定并且禁止这本书，并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出版了一部修正主义的党史来代替它，这也是毫不奇怪的)或在其它文件中找到。

所以，赫鲁晓夫为了要重新捡起那些曾经被否定了的纲领，就不得不为提出这种纲领的人恢复名誉；反过来说，起用了那些人也就是为了恢复老的政策。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在撤销中央计划经济部的同时，却在报纸上大肆赞扬前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件事决非巧合。因为沃兹涅先斯基是由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采取了和赫鲁晓夫路线相同的措施而被捕处决的。而且，正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好象有些限度是他不能公开逾越的。这就使他没有能在一九五六年公开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其他“人民领袖”恢复名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反对农业集体化并且维护富农的利益。① 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为反对“莫斯科官僚政治”而到处作的演讲，毫无疑问是重弹托洛茨基流放初期所作的恶意宣传的老调；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对托洛茨基未作评论，这也是很引人注目的。

全 面 清 党

赫鲁晓夫为了推行他的纲领，首先必须在党内获得全胜。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被赶下台以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这些人成了赫鲁晓夫推行其纲领的阻力。从一九五七年起，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集团不断地污蔑和诽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1970年纽约版，第385页。

谤所谓"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及有关人员。在这场斗争中，几乎撤换了党的全部领导成员。"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有类似的变动。①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地下马列主义小组的小册子说道，一九五七年，在党的基层集会上，"从前曾批评二十大决议的人"——就是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人——"都被迫公开认错"。② 基层人员的变动达到什么程度，还找不到具体数字加以说明。

这些数量上的变化足以说明党的性质起了变化。例如，凡是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干部，就不得不让位给那些赞成这种理论的干部。赫鲁晓夫为了使"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以及"和平竞赛"的总路线成为全党的路线，就必须把那些学习过列宁批判考茨基的文章并且赞成列宁观点的党员清除出党。赫鲁晓夫把考茨基的观点挖掘出来加以美化。这样，通过一系列广泛的对党员的清洗，党在政治思想上就从马列主义的党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党了。

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比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蜕变走得更远。一九六一年他宣称，既然苏联已经不存在敌对的阶级（他在这一点上依靠了斯大林的错误），就不再需要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因此，苏联国家就成为"全民国家"，苏联的共产党就必然被称为"全民党"，而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就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8—409页；《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1972年地拉那版，第258页。

② 《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布）的纲领和原则》，1967年纽约版，第4页。

党的阶级成分来说，这种新理论的意义在于不再限制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或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的人入党。据官方解释，既然阶级不再存在，申请入党的人的阶级成分就无关紧要了。几个西方作者在论述苏共党组织的"改革"时注意到，"改革"的结果是，党为经理、工程师、行政官员、高级院士以及在日常生活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的人敞开了大门。历史学家约翰·哈泽德写道，党籍变得"象英国的爵位"一样，是奖给有成就的行政官员和工程师的一种荣誉，而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和领导能力如何。①

党的社会阶级成分改变了，党的作用也就有了新的定义：赫鲁晓夫称之为"生产原则"。赫鲁晓夫下令党的干部必须把改善经济管理和促进生产的任务放在政治领导和意识形态之上。② 这样一来，党就明显地变成了经理的党。与此同时，这些经理的权力扩大了不少。为了使"生产原则"得到预计的效果，赫鲁晓夫就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只是在最高级才合二为一。他还建议一定要把地方党组织官员的工资和他们属下的工厂和农庄的"经济成就指标"联系起来。③ 这就是说，党员的工资应当根据他们经营企业赢利的多少而发给。

赫鲁晓夫对党的"改革"，除了明显影响党的阶级成分之外，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破坏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国家政策的基础——工农联盟。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加强工农、城乡关系已不再是地方党组织干部的份内工作。这些党的干部不是属于工业党，就属于农业党，彼此分裂，形成对立。

---

① 巴林斯基：《六十年代的苏联计划工作与市场》，1967年新不伦瑞克版。

② 林登：《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集团》，1966年巴尔的摩版，第149—152页。

③ 亚历克·诺夫：《经济的合理性和苏联政治》，1964年纽约版，第93页。

反抗和资产阶级道路

所有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措施，都是以反对莫洛托夫及其同盟者的“教条主义”作为掩护而进行的。后来，重新开展了诽谤斯大林的运动。一九六一年，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红场，达到了高峰。当赫鲁晓夫的纲领向前推进的时候，苏联劳动人民越来越显示出不安和反抗。苏联问题专家康奎斯特（他决不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明确地说，“每一次缓和”（指赫鲁晓夫领导的每一次重新发动的反斯大林运动）都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包括一九六二年诺沃切尔卡斯克城爆发的“大骚动”等事件。① 这样的反抗行动，很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每发动一次反斯大林运动以后，苏联领导集团总要有所退却，说斯大林几句好话，撤销自己的某些提议。不过，他们的基本方向不变。

自从苏共蜕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后，很难得到反映苏联“新”共产党的内部生活的消息。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推断出来：苏共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斗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本人被赶下台及其以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但是，至少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党内似乎没有任何领导人或集团公开反对赫鲁晓夫路线。从暴露的事实或者根据人们的推理来判断，存在于高级阶层中的分歧，并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和马列主义者的分歧，而是资产阶级的这一派和那一派的分歧。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产业工人》，1967年纽约版，第11页。

六、苏联工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被剥夺了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集团篡权之后，苏联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原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民经济体系，现在被一个代表新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所掌握了。

换句话说，苏联社会的上层建筑（至少是要害部门）已被资产阶级势力所控制。但是，基层的经济部门依然或多或少地还象从前那样，继续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在进行工作。

就苏联社会的基本所有权关系来说，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国家政权，其本身就是对苏联无产阶级的剥夺，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结束。主要的生产资料虽然仍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却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所有"。资产阶级势力以篡夺国家政权的方式篡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赫鲁晓夫集团就是这样使工人阶级重新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而这种分离现象正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经过不断斗争才克服和消除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实现了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统一，又一次出现破裂了。赫鲁晓夫篡夺了国家政权，就是苏联新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

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

工人阶级被剥夺

正如马克思在当年论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第二次发展（这一次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实质上也是一个暴力过程。资产阶级化了的苏联军事领导集团在赫鲁晓夫篡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②

总之，按照社会主义的完整意义来说，随着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被剥夺，苏联早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就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事实上，在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无所畏惧地宣布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的；四十年以后发生的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的所有权，则是如此地隐蔽，直到几年以后，当后果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才使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确实已经发生。这当然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重温一下马克思的著作便可知道，资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它一贯是用伪装来掩饰其种种罪恶的掠夺行为，包括剥夺封建主的所有权时也是如此。他们剥夺无产阶级的所有权时，更是如此。

然而，同时也得说明，无论在一九一七年的正面事件，还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反面事件中，生产资料所有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立即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发生全部的变化。譬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当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82—783页。

② 同上书，第782页。

在苏联经济基础中占优势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是一批生产规模不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进行长期的、曲折的斗争，才改造了旧的经济基础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国家政权，获得了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权，但是，要全部改变包括基层的原有的生产关系，那还是以后的事。

攻击中央计划工作

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对经济领域的主要打击，如撤销中央计划部门并将机器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等，本文前已论及，现在再补充一些细节。

正如论述这一时期问题的几位作者所说，撤销莫斯科中央工业部门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赫鲁晓夫的策略行动，是出于他当时反对所谓"反党集团"派系斗争的迫切需要。因为他在领导权上的主要对手（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人，还有一九五六年六月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的莫洛托夫）都还有势力，并同中央各部有密切的联系。赫鲁晓夫撤销这些部就剥夺了他的政治劲敌的实权地位。①

这些策略上的动机，可以说明赫鲁晓夫本人为什么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回过头来重新建立某些中央工业部门；而他的继承者在一九六五年能够进一步恢复若干中央工业部。事实表明，这些重建的各部的人事班底被彻底更换了，而且他们所制定的那种"计划"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同时，赫鲁晓夫

① 参阅皮斯特拉克：《大策略家赫鲁晓夫》，1959年纽约版，第247页；克兰克肖：《赫鲁晓夫是野心家》，第246页。

对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部门的打击，由一百零五个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这些部门的职责，直接导致商品货币关系的复活和扩大。

在论述这一时期情况时，一个资产阶级作者正确地指出："莫斯科的部长可能有狭隘的本位主义偏见，但他至少能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鄂木斯克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却看不到鄂木斯克省范围以外的事。当他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尽管他的愿望很好，他也不能适当考虑国家的利益。"① 所以，撤销中央各部的直接后果是，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每个小地区都只为它自己。

但是，计划虽可分给一百多个地区去制订，物质生产过程却不行。先进的大规模的工业需要全国许多地区提供原料，并且向全国各地输送产品。所以，苏联的地区委员会感到在新的体制下，要获得必要的原料、物资以及向本区以外销售产品，都是大伤脑筋的事。企业领导人对这些问题更觉得头痛。正如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怨言所证实，仅存的中央协调机关和经济情况预测机构都无济于事。② 企业领导人无可奈何，只得依靠自己的"企业"和依靠"机灵"的手段了。

萌芽时期的"自由市场"

正如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所说的，苏联各地出现了一个"非官方的企业联系网"，如拉私人关系、走后门、找掮客、行贿送礼等等。它代替了过去中央集权计划制度所提供的全国范围的企业联系。一个企业领导人需要原材料时，就打电话给另一个地

① 亚历克·诺夫：《经济的合理性与苏联政治》，1964年纽约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区拥有这种原材料的老朋友，或和一个知道哪里可以搞到这种原材料的掮客联系。所有这些交易，都是在各种掩护之下，通过私人谈判，不按手续，在"帐外"搞的。一支真正的掮客队伍……帮助着企业领导人解决最困难的物资供应问题。这些专门做掮客的人，知道在遍及全国的"自由市场"上，哪里可以获得所需的各种各样原料和设备。①

这种市场实际上还不能算是自由市场，所以我们给它加上了引号。它是一种非法市场。按照现行苏联法律的规定，企业领导人和掮客，如果搞计划外的交易而被逮住，就会受到严厉处分。但是，在这种新制度下，这样的市场实在太需要了。检举的事情又很少，把这些市场叫做"灰市"，更为恰当。

不难看出，这种"灰市"掮客就是二十年代"耐普曼"的化身。同样，企业领导人同其他企业搞计划外交易，就使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曾允许合法存在的企业联系恢复了，在那个时期允许各企业彼此自由买卖生产资料和产品。② 但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作为有限度地倒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而暂时允许合法存在的事物，到二十年代末就宣布为非法，而且实际上已被取缔。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却反其道而行之。企业领导人的权力逐渐增大起来了。

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措施是：废除对于没有完成计划的企业领导人加以刑事处分的"危害经济法"。

专门研究苏联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格拉尼克写道："新规定比过去的法令放宽多了。"又说：赫鲁晓夫"对于解决苏联企业管理部门以前遇到的困难问题起了很大作用"。③ 他不是使工人

① M·米勒：《俄国消费者的兴起》，1965年伦敦版，第33页。

② 参阅莫里斯·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经济发展情况》，1966年纽约版，第131—148页。

③ 大卫·格拉尼克：《红色经理》，1960年纽约版，第43、136页。

在调整生产方面担负更大的责任，而是扩大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并使他们的非法勾当合法化。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这个报告吹嘘，到一九八〇年，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把“进一步逐渐扩大……企业的经济权力”① 列入党纲，这就使人对这一点不再有什么疑问了。

私人交易合法化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苏联许多地区的工人纷纷向当地法院控诉企业领导人非法解雇他们。② 大部分工人胜诉而恢复了工作；企业领导人当时做法未免太匆忙了。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企业领导人实际上获得了任意开除工人的权力，而且他们的私人交易也合法化了。

可见，赫鲁晓夫在工业方面的重大“改革”，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全面性的。“改革”逐步扩大了商品货币关系(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的领域。最初，这种扩大行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后来就逐渐合法化了，最后终于把进一步扩大这种范围的要求写入党纲。

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据点的进攻，比工业领域更直接、更彻底，这已经讲过。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期间，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国家把机器拖拉机站全部卖给集体农庄。这是国家为了集体农庄的“利益”而“放弃”自己权利的一个事例。这是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公然篡改。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种措施会使集体农庄成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9页。

② 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产业工人》，1967年纽约版，第20页。

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① 但是，斯大林的这个分析以及他提出的这会导致资本主义再生的警告，却都被赫鲁晓夫列为同“个人迷信”有关的“教条主义”，遭到攻击和摒弃。②

集体农庄“自由化”

赫鲁晓夫在出卖机器拖拉机站的同时，还取消了国家给集体农庄规定的生产计划指标。这样一来，集体农庄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任何企业更加“自由化”了——除了商品交换关系以外，集体农庄同城市就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了。过了不久，一方面由于集体农庄必须解决维修自己的农业机器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集体农庄牟利心切，国家被迫提高若干农产品的控制价格。这项新措施直接使一九六二年肉类和奶类产品的零售价格分别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③

然而，赫鲁晓夫的这些措施还不足以能使资本主义复辟。到一九六一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被搞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但其主要脉络依然存在。这就使苏联新资产阶级领导集团要发动一次新攻势，经过四年多的恶意宣传和一系列的破坏和清洗，才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摧毁了。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4页。

② 林登：《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集团》，1966年巴尔的摩版，第61页。

③ M·米勒：《俄国消费者的兴起》，1965年伦敦版，第235页。

七、利润挂帅

如果要为二十世纪的巧伪人，特别是那些政治上罪大恶极的巧伪人写一部历史实录的话，就应当有专门一章来写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纲领。

这是整个苏联、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的混乱时期。原有的经济体系，被赫鲁晓夫从内部破坏了，一部分被他变卖了，不再象从前那样起作用了；而取而代之的经济体系，其轮廓如何，还不清楚。似乎是要给这个含糊不清的转变指明意义和方向，赫鲁晓夫宣称：到一九八〇年，苏联就将成为一个无阶级的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现在已经开始。

赫鲁晓夫这个声明，似乎是要使他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要"全民国家"）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要"全民党"）等政治观点具有一致性和合法性。如果共产主义即将实现，阶级差别已经完全消灭，人人都成了无产阶级的一分子，那末，赫鲁晓夫就有理由说："我们对哪一个阶级可以实行专政呢？我们没有这样的阶级。"①

但是，另一方面，当问题接触到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方案时，那就连这种形式上一致的薄薄外衣都没有了。那些想透过赫鲁晓夫的华丽辞藻，仔细寻找有关具体的经济建议的人们，会发现这个方案的内容杂乱，自相矛盾。例如，在需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89 页。

要“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它开辟越来越广大的天地”① 这个动听的标题下，所作的解释是“要求进一步逐渐扩大地方机关及企业的经济权力和责任”。②

这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它的所谓“群众”，实际上就是指企业领导人。所谓发挥“首创精神”，指的是增强企业领导人镇压工人的权力。同样荒谬的逻辑表明赫鲁晓夫处理经济问题的态度。

利 润 挂 帅

赫鲁晓夫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杠杆，即卢布监督、价格、利润等。我们应当增强利润和赢利率所起的重要作用。”③

换句话说，“向共产主义进军”不是靠降低和逐渐消除利润和赢利率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来实现，而是相反地靠扩大和增加利润和赢利率来实现。赫鲁晓夫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就说：“在加速新企业的建设、开工和掌握生产方面，我们也要向资本家的好榜样学一学，这并不算什么过错。……我们也不应忽视外国的有益的经验，而是要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所有从技术、组织观点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包括在加速资金周转和从投资得到更大回收率方面的有价值的东西。”④

赫鲁晓夫说的是，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技术，而且还要采用西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48 页。

② 同上书，第 349 页。

③ 同上书，第 349 页。

④ 同上书，第 347 页。

方公司在经济组织方面以最快速度获得最大利润的秘诀。

赫鲁晓夫的这几段话裹上了不少"共产主义即将实现"的保证和诺言，不注意的读者根本不可能领会其意义。然而，这些话却是赫鲁晓夫纲领的实质，而其余都是伪装。在二十二大闭幕后不久就展开、直到一九六四年初赫鲁晓夫下台前夕才结束的那场"经济问题大辩论"中，赫鲁晓夫纲领的实质才算清楚了。

这场表面上是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各种经济刊物上开展的"辩论"，实质上是苏联社会内新资产阶级的两大营垒之间的一场派系斗争。大致说来，一派主张维护官僚计划机构的利益，或者说，维护官僚计划机构尚未失去的那部分利益，反对扩大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另一派则主张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应当超过官僚计划机构保留的权力。

令人深思的是，两派都没有为恢复"反计划"① 或群众直接参与计划工作过程而奋斗。

"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

"计划派"主张推行所谓"标准成本"制。这是一种新办法，但仍使国家计划控制企业的核算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这基本上只是对旧体制稍作修改；据说可以迫使企业领导人节约使用原材料和其他物资。"计划派"提出这个新花招，是想要基本上不触动原有的计划方式，因而在辩论中被人称为"保守派"。

另一派，自称为"自由派"的，则是以乌克兰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为代表的一批分散各处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主张也有千差万别，而且在辩论中往往看风使舵，改变论点的侧重面，但他们的主要论点都是要求加强利润的作用，增强

① 斯大林时代，工人倡议突破厂长制订的保守计划。——译者

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削弱国家计划对企业的控制。

关于利润问题，“自由派”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同企业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利别尔曼辩解说：归根到底，社会总生产必须超过社会总消费，必须对整个社会提供利润；而“凡是对社会有利的也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利”。①

但是，尽管利润的作用是争辩的中心，利别尔曼及其许多同伙却强调说：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写道：“有人议论诸如标准成本和利润孰优孰劣等问题，我们感到很奇怪。”利别尔曼强调指出：他们建议的不仅仅是“要修改计划指标，而且……要改变企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这就需要改变“体现这种关系的整个制度”。②

毋庸置疑，利别尔曼派的建议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企业领导人的观点：他们不仅想要掌握更多的权力来控制工人（在这一点上，两派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且企图夺取更多属于计划机构的权力。“自由派”理论家们想方设法地暗示明言：为使企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必须让企业领导人摆脱上级束缚，允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由自己决定在何处购买原材料以及在何处和用什么价格出售产品。其实，自从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改革”以来，企业领导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干了，不过是偷偷摸摸非法搞的罢了。所谓建立“企业同国民经济之间的新关系”这句口号，无非是想使他们的要求合法化。这些企业领导人是想要当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老板。利别尔曼的诡辩：“凡是对社会有利的也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利”——逐字剽窃于亚当·斯密。利别尔曼成了企业领导人的先知。

① 参阅E·札莱斯基：《苏联的计划改革》，1967年查佩尔希尔版，第79页。

② 费尔克：《苏联经济问题论战》，1966年剑桥版，第87页。

然而，据报道，大辩论的头两年，“自由派”在报刊这个阵地上很不得势。“标准成本”论者因强调旧体制，赢得了习惯势力的支持；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标准成本”制这个新花样已经在鞑靼、顿涅茨克和立陶宛等地区进行试验，据说效果良好。对比之下，“自由派”提出的建议则纯粹是一套未经试验过的理论上的臆测；即使作为理论来说，许多人对它的正确性也怀疑，因为利别尔曼等人对利润的强调毕竟带有资本主义的气息，显然贬低了计划的作用。一九六四年初，“自由派”继续采取守势，后来就逐渐销声匿迹了。而在“标准成本”论者的文章中则开始流露出了胜利者的语调。正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亲自插手干预了，他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官方声明，赞成“自由派”的“利润”论；党的领导力量作了利别尔曼派的后盾。

一九六四年夏，“标准成本”论者遭到致命打击。以Л·列昂节夫院士为头子的一批吹捧赫鲁晓夫的著名“学者”纷纷出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辱骂“反利润”论者是“斯大林主义”。列昂节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前的问题是要决定利润是否应该成为评价企业经营成果的唯一主要指标。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忽视了不可改变的经济规律。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这种规律都是起作用的。国民经济中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生产上的消耗。这个原则，不管过去如何被人忽视，现在就为苏联以利润作为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①

这种恬不知耻（似乎苏联经济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没有发展）的、充满形而上学观点的吓唬人的论述，无异向“标准成本”论者发出警告：要是他们顽固到底，那就要落到所谓“反党集团”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终于获得了胜利。赫鲁晓夫准许“自由派”在数家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企业试行他们的某些改革

① 费尔克：《苏联经济问题论战》，1966年剑桥版，第77—78页。

措施，而他们的对手所做的试验则被迫停止。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

然而，赫鲁晓夫在当权期间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一九六四年十月，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伙伴们施展权谋，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的开垦"处女地"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歉收，他把苏共分裂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等策略实际上行不通，他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对南斯拉夫、古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作风粗鲁（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猛击讲台）——这一切使赫鲁晓夫成为人人耻笑的小丑，再不下台，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就要被他弄得名誉扫地。

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批评他"主观主义"、"太冒进"了，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在实质上和作风上作了一些细微调整。但同年十一月初，却又迫不及待地宣布，他们仍将执行赫鲁晓夫的基本路线，把他的经济改革继续搞下去。① 一九六四年末，他们扩大了改革试验，并且在重工业部门首次试行新经济体制。②

当时，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快了。一九六五年三月，苏共中央全会宣称"制订一套使经济体制更趋合理的措施"的时机成熟了。同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经济学家、企业领导人和主管计划工作人员来"制定措施"。据《真理报》报道，该会议一致认为："精简上级机关规定的计划，削减下达企业的指标数量，以便为企业进行独立经营和发挥稳健的创业精神提供条件……的时机已经到来。"

① 林登：《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集团》，1966年巴尔的摩版，第225页。

② 费尔克：《苏联经济问题论战》，1966年剑桥版，第51页。

时 机 已 到

据《真理报》报道，会议也一致认为："把利润指标评价企业经营成果的作用提高到一切指标的首位，并使利润成为提供企业基金的一个主要来源……"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解决所谓"市场"问题的时机同样成熟了；"市场问题不仅消费品有，生产资料上也存在；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①

一九六五年九月底，苏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在全会结束前，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冗长的报告，宣布了一整套经济"改革"措施。一位西方学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自斯大林一九二八年实行用以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以来最突出的经济改革措施"。② 然而，这一套措施和社会主义经济背道而驰，那是一清二楚的。这些措施不是使企业服从国家计划，而是实际上（最终将完全）使国家计划服从企业；不是消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市场，而是使这种市场巩固、扩大和合法化；不是制止企业追逐利润，而是把利润提到原则高度。总之，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复辟资本主义。

① 费尔克：《苏联经济问题论战》，1966年剑桥版，第91—92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八、柯西金压制“怠工”

一九六五年，苏共领导急于要改革经济体制，主要是担心工业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

同年九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代表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建议中，小心翼翼地强调了成就的一面。他列举了一连串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刚结束的七年计划时期的生产发展情况。

但他又指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才使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应该指出，近几年来，每一卢布固定基金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数额有所下降。近几年来，工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有些缓慢了。”

除了那些含糊其辞的表述之外，他并没有探究速度下降的原因。然而，一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字终于在五年以后公布了。我们在评论这项建议之前，值得研究一下这些统计资料，以便对苏联领导集团当时的困难处境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

据苏联研究所谓“投资效果”问题的第一流专家季·哈恰图罗夫院士的说法：“反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果的最一般的指标”是国民收入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基金（即固定基金同流动基金的总和）之比。这一比例表现为每一卢布基金能提供多少戈比的收入。如果每一卢布基金所实现收入的戈比数增多，表示经济“效果”提高，是好现象。反之，则表示经济“效果”下降，是坏现象。因此，根据这一比例，就可以判断“计划编制的合理程度以及物力和人力的利用程度”。

哈恰图罗夫指出，这个一般指标的历年变动趋势如下：①

1959 年	62.6	1963 年	55.0
1960 年	61.6	1964 年	54.7
1961 年	60.5	1965 年	53.2
1962 年	58.2		

这个反映“经济效果”的一般指标的变动趋势表明，每一卢布基金提供的收入年年递减。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期间差不多减少了十戈比。正如哈恰图罗夫指出的：“在七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这个指标的下降，说明苏联经济中存在着不顺利的现象……”

工人的消极抵制

更确切地说，这些不利现象是什么呢？哈恰图罗夫在上述文章中强调“主观原因，即是由于计划和管理方面的缺点造成的”。尽管他用词谨慎，但显然指的是赫鲁晓夫通过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计划工作的制度，这套制度因有许多毛病而在一九六五年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废除了。

但是，哈恰图罗夫在以后写的一篇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尽管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却不露声色地把原来的说法收了回去。他把工业部门中一个工人平均摊到的基金数额和一个工人平均生产的产品产值的增长率进行比较：②

---

① 季·哈恰图罗夫：《经济改革和投资效果》，载于《苏联经济改革的进展和问题》，1972 年莫斯科版，第 159 页。

② 季·哈恰图罗夫：《论改进测定投资效果的方法》，载于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73 年第 3 期。

	增长率 1950—1955	增长率 1955—1960	增长率 1960—1965
一个工人平均占用的基金	50%	44%	43%
一个工人的平均产值	49%	37%	26%
差额	−1%	−7%	−17%

上表的第一行表明，每个工人占用基金的增长率下降了。原因很可能是计划工作和生产协作方面的缺点。人们似乎有理由说，由于按地区进行计划工作所固有的地方主义作祟，工厂管理部门不能以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惊人的速度增加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每个工人产值的增长率也在下降（见表第二行）。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说明：为什么后者较前者下降的速度要快得多。

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五年期间，每个工人占用的基金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每个工人的产值的增长率也几乎相等（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这符合人们的意料：工人得到的机器越多，产量也越多。但是，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六〇年期间，每个工人的产值增长幅度比每个工人占用基金的增加幅度减低了百分之七；而在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五年期间（柯西金“改革”经济体制的前夕），两者的差距更为惊人，竟达到百分之十七。

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而工人生产的产量却越来越少！

哈恰图罗夫甚至不敢对这些发人深思的数据加以说明，这是不足为奇的。除非新机器的效率大大低于旧机器（但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这些统计数字就直接作出了一个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不安的结论：苏联工人阶级不再关心劳动生产率，

而且在消极抵制。

尽管赫鲁晓夫曾经下令全国各工厂重新测定工时定额①，要求大大提高机器作业的产量指标，但是，在生产中，工人却根本没有发挥出象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一再创造出惊人的英雄业绩的那么一股干劲和那种生产热情。

产业工人不仅没有鼓足干劲、很好地把生产搞上去，而是在生产中改变战略，进行消极反抗。尽管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不断增加，但工人并没有把精力和才能用来实现和发展这些生产能力，而是设法使它落空。

党站在企业领导人一边

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的各项统计数字，反映出工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主要根源在于：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期间，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篡夺了国家政权后，工人阶级的权力被剥夺了。尽管当时或许只有少数觉悟高的工人意识到自己被剥夺，并得出了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描述资本主义早期情况时所作的类似结论："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②，但这种变化，不管修正主义者怎样偷天换日，一般工人也还是可以觉察出来的：

在斯大林时代，党支持工人反对滥用职权的企业领导人。赫鲁晓夫篡权之后，党转变了阶级立场，扩大了企业领导人压制工人的权力。工人对此难道会注意不到？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那些没有完成计划或在劳动强度、劳

① 可参阅玛丽·麦考利：《1957到1965年苏联劳工争端》，1969年牛津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32页。

动组织和劳动条件等方面违反国家规定的企业领导人，几乎从来没有受到惩处或被撤换。工人对此难道会注意不到？①

诸如此类的权力转移，足以使广大工人了解到新的所有制关系的实质，从而采取了象马克思一百年前所说的那种态度来对待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与工人无关，……"②

怠工，这一真正惊人的事实是苏联工人进行消极的抵制。毋庸置疑，这也是一九六五年苏共领导人最伤脑筋的事。

寻找控制工人的方法

寻找控制工人方法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苏联社会发生了反常的过渡局势。工人被剥夺了权力，不再掌握国家政权和拥有生产资料了。他们就在生产岗位上消极怠工，进行反抗。

资产阶级尽管拥有生产资料，篡夺了国家政权，但许多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束缚着它的手脚，使它不能掌握全部武器去强制工人加快生产速度。

新资产阶级的王牌武器是开除工人和根据"经济理由"解雇工人的权力。这种权力表明，劳动力已经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买卖。换句话说，只要劳动力具有商品的性质，生产资料占有者就有权把工人抛到街头。

因此，生产资料所有者也有权买卖生产资料，如：撤销无利可图的部门，停止生产某种商品而改生产另一种更为有利可图的商品，等等。

---

① 可参阅玛丽·麦考利：《1957到1965年苏联劳工争端》，1969年牛津版，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2页。

不言而喻，这两种权力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若要行使一种权力，必定要施行另一种权力。

然而，正是这两种权力才使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如果认为基本的、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能占一个很长时期，那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篡夺了国家政权，进而剥夺了工人阶级，必然会引起工人阶级抵制增产。这种抵制运动发展下去，很快就会使剥夺者的经济地位动摇起来，普遍生产不足的危机是掩饰不了的。

公开的反抗——罢工、暴动、起义等等可以制止，而且可以用枪杆子来对付。但是，众所周知，靠刺刀来推动工厂中的日常生产是毫无效果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每家工厂，对每三个工人都派一名士兵进行监督。这只会引起公开的冲突。为了压制工人在生产中的消极反抗，资产阶级需要另外一种武器。这些武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所固有的。资产阶级不会放过它们不用。虽然它们可能担心某些后果，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公开变为商品有些犹豫，但资产阶级必然会打破一切顾虑，开足马力奔向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五年九月，柯西金在建议“改革”经济体制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现有的工业管理、计划工作和刺激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技术经济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

九、柯西金篡改列宁的论点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实行一整套措施来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创造性以及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基层单位——企业的作用。"

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立即正式公布。

由于新的经济体制的措施涉及的面很广，要使当时的五万多非农业企业都纳入新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结果花了几年时间，经过几个阶段，任务才算完成。到一九六八年末，实行新体制的工业企业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二，其利润约占工业利润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到一九七〇年末，它们分别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换句话说，"建议"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已经全面贯彻了。①

新体制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请读者不要厌烦，且看柯西金的一些原话就可大致了解。

柯西金说："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建议减少上级为企业规定的指标数目。"所谓"上级"是指计划主管部门。他又说："为了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利润和赢利率指标。利润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企业对国家纯收入

① Н·И·德罗吉钦斯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新计划方法局局长）：《经济改革实施情况》，载《苏联经济改革的进展和问题》，1972年莫斯科版，第200—202页。

的贡献。”

这样，就“鼓励”企业去“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制度一定要废止，相反，“必须把更多的利润留给企业支配，其数额大小，同企业使用国家拨给固定基金的效果成正比……”

依靠物质刺激

“企业在增加利润和提高生产赢利率方面的成就没有直接表现在企业职工工资上”的情况也必须消除。为此，每个企业必然另设一些“基金”，包括“物质奖励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其数额的大小，取决于企业赢利率的高低。

而且，“企业支配流动资金、折旧提成以及从出售剩余设备和其他物资而收回的资金的权力要扩大”。

“企业动用当年工资基金节余的权力也要扩大……”

在这方面的所谓“正面典型”，就是一九六四年曾作为新体制试点单位的莫斯科运输联合公司。据说，它在“……出售多余的卡车和设备，裁减多余的人员”以后，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在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要加强各企业的“经济责任”。在物资供应方面，要“更广泛地发展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的直接联系”。

至于价格方面，“为使工业生产部门采用经济刺激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要求改进价格制度。价格必须越来越能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消耗，致使生产费用和流通费用得到补偿，并且保证每个正常经营的企业获得利润。”

企业和国家之间的财务关系，也要转移到新的基础上来：“国家对企业的基建投资的拨款应加以限制，贷款的使用应加以

扩大。”

最后，对各主要工业部门，重新建立中央各部，以取代赫鲁晓夫建立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同各部密切相关的是，还将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采用经济核算制的部门性联合公司”。各部将把“许多经营职能”移交给这些联合公司。新建各部将“在同过去的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如果认为“这只是复旧，那就意味着没有考虑到一系列新的情况，就会犯错误”。

新措施的特点大致如此。透过柯西金含糊其词的报告①，我们来看看他说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柯西金歪曲列宁关于利润的论点

假如柯西金能够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朋友们，同志们，总之，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正在尽快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这将是一个拥有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和其他应有尽有的好东西的真正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那该多好呢！那就不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花许多精力去进行揭露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柯西金在结束报告时，不仅不是直言不讳，而且还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扬言，这些新措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向共产主义所有制过渡”的一个重要过程。不仅如此，他还硬说这些新经济措施的主要特点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本人认可的。柯西金竟说：“列宁曾经指出，每个企业都应按照赢利原则经营，完全以收入补偿支出，并获得利润。”

总之，谁要是不按照苏共领导集团指引的方向滑下去，谁就不仅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从而变成不折不扣的反

① 引自1965年9月28日苏联《消息报》。

党分子，而且是狂妄到胆敢给列宁上政治经济学的课！

关于企业利润问题，列宁曾这样说过："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会是主要的。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够赢利，由于必然会发生照顾本位利益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上述情况就难免不在各企业劳动条件的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其主管机关利益的某些对立。因此，在社会化的企业中，工会就一定要负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根据可能促进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①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国家因遭受战争破坏和饥馑而不得不有限制地暂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毫不犹豫地称它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如此，列宁还一再说明这种关系必然会产生"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并且号召工人群众组织把"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把这一任务"公开地提到首要地位"。②

而柯西金又是怎么样呢？这个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言人，由于工人对强行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抵制，不得不提出一些最荒谬的托辞，给这些措施挂上"共产主义"的招牌，否认有任何"阶级对抗"或"利害冲突"的根据。更有甚者，它竟然胆敢盗用列宁的权威！如果不是它们掌握着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切合法手段，控制着教育系统，并有警察、法院等全部专政机关作为它的后盾的话，这种大骗术是很可笑的。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83—584页。

② 同上书，第583页。

列宁建议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困难情况不需要再加以阐述了。但是一旦克服了这些困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了优势之后，企业利润的作用自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个别生产单位，甚至某些工业部门，往往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内（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永久的）有意识地让它们有"计划亏损"。这就是说，尽管职工作了最大努力，但从帐面上看，收入抵偿不了支出，也没有任何"利润"。

苏联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国家有意识地提高棉花的价格，以鼓励集体农庄生产更多的棉花；还有意识地降低棉织品的价格，以便使工农都有衣服穿。这样一来，用棉花纺纱织布的纺织工业，在帐面上必然出现亏损。纺织工业的这项亏损，是用其它赢利部门提供的部分利润来弥补的。

国营经济部门提供的一切利润都直接集中在国家手中，通过计划进行再分配，以赢利部门和企业上缴的一部分利润弥补不赢利的部门和企业的亏损。国家计划则反映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所决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先后顺序。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工业就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润，而是要服从于让棉农有饭吃、劳动人民有衣穿的这一更高的目标了。换句话说，纺织工业的"利润"，不是通过货币形式计算的，而是通过满足人民需要的形式实现的。

只有这样，才是正确处理了工人阶级的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再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生产资料生产的周期一般都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周期长，相对来说，不可能立即获得赢利。但是，消费资料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却依赖于生产资料生产不断增加。不仅如此，要减轻劳动强度和缩短劳动时间，减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减少工作日等长远目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发展。

如何对待工人的就业问题呢？难道应该把工人从一些生产社会必需品而无利可图的工厂调到另一些生产奢侈品而赢利的工厂去吗？还是干脆把他们解雇，抛到大街上去呢？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资产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作出的回答，历来都和无产阶级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提高。"①

苏联一九六五年经济"改革"措施中体现的利别尔曼观点，与此恰恰相反："凡是对社会有利的也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利。"这就是说："凡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也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不过利别尔曼的话说得比后者更"巧妙"一些、隐晦一些罢了。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十、推行血汗工资制

如同《旧约全书》中所说那些提到上帝的名字就要发抖的部落一样，苏联新经济体制的吹鼓手们非常害怕把劳动力叫做商品。

在苏联官方发行的书刊中，经常说到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经济范畴，即使赞扬“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好处，也是完全可以的，甚至是必需的。可是很奇怪，当问题一牵涉到劳动力这个经济范畴（还有生产资料，这一点留待以后再讲）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却变得张口结舌；而平素夸夸其谈的政界发言人也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难言之隐。

在柯西金的一九六五年“经济改革”纲领里，并没有诸如要求把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条文，甚至没有露骨要求授权企业领导人根据经济上的理由雇用和解雇工人。它只是从侧面提到要扩大企业“动用当年节余的工资基金的权力”。柯西金为了启发在场听众中那些头脑愚钝、不知怎样才能使工资基金有节余的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五家试点的运输企业，“出售了多余的卡车和设备，裁减了多余的人员”以后，就昌盛起来了。

同样，随着这个新经济体制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几家试点工厂推广到全国各地，苏联工人不再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赋予他们的就业保障了。他们再次沦为雇佣工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成为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柯西金在总结试点经验时，恬不知耻地说：“这个新的计划

工作和经济刺激体制已使工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他满意地指出，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一倍多。从几年后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全国实行新体制的长期成果并没有完全达到试点企业的水平，但基本趋势是相同的。

一九七三年，据研究“投资效果”的专家哈恰图罗夫院士观察，一个工人的平均占用资金额同一个工人的平均产值之间增长率的差距，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逐年扩大，但在实行新经济体制的那个五年计划时期，又缩小到接近百分之二。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粉碎了工人的消极反抗。怠工现象已不再出现。增加产量而不增加工资的要求更是坚定不移了。

谢基诺试验

新体制的早期成果公布后，苏联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当权派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开始试行各种方法，以使新经济体制有更大的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试验是一九六七年在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开始进行的。

经济学家T·巴兰年科娃在一篇概述谢基诺经验的文章中写道：“进行谢基诺试验的各企业都打算裁减大批工人。”每家企业平均“裁减”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人。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合并工种”或“增加”留用工人“工作量”的方法，以裁减劳动力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解雇工人而“节约”下来的工资基金的一部分，作为刺激留用工人的“奖金”，据说这是谢基诺方法的一项创新。结果，旷工现象显著减少了。“工人按照这个试验规定的条件干活，已使企

业的生产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确实的成果。"①

总之，苏修领导集团除了用资本主义制度下惯用的那种驱使雇佣奴隶干活的典型方法(加快速度，迫使一个工人干两个工人的活)以外，还用"人吃人"的方法，即把从被解雇的同志们身上割下来的几小块肉丢给留用的工人吃。然而，留用工人所得到的"人肉"也只有几小块而已。巴兰年科娃说：留用工人得到的"奖金是微不足道"的。狂热鼓吹谢基诺试验的经济学家E·马涅维奇也写道：进行试验的大部分工厂中，这种"奖金"的数额"少得很"。②

事实必然会证明，谢基诺体制的独创性不在于外表诱人的"奖金"，而在其解雇工人和使工人拚命干活的实质。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本身在试验时期就裁减了整整一千名工人，这表明整个试验中被"裁减"的劳动力不在少数。一九六九年十月，苏共中央通过了谢基诺原则。一九七三年年终时，全国约有七百家企业实行了谢基诺原则。③其他企业的领导人只要认为谢基诺原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可随时仿照办理。

奖金和加强劳动强度

巴兰年科娃说，采用谢基诺体制的企业多是在较大的城市内。在大城市中，熟练工人缺乏，因而他们在就业和确定工资高低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企业采取谢基诺试验的经济目的很清楚，就是有意识地要使熟练劳动力的不足变为过剩（产业后备

① 巴兰年科娃：《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动态》，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70年第2期。

② 马涅维奇：《改进劳动力的使用方法》，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73年第12期。

③ 同上。

军)。

马涅维奇援引了基洛夫城某企业经理B·佐诺夫的话，那个经理曾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说："以前，我们厂感到司机、金工、镟工、技工……不足，然而，我们厂实行谢基诺体制一年半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得出结论，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往往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权对分担别人任务的工人多给一些报酬，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发现一种新的后备劳动力。事实证明，问题不在缺少人力，而在生产的组织和运用经济杠杆的能力如何。"①

不用说，一旦出现产业后备军，当初那个因"分担他人任务而多得些报酬"的工人就可能被新雇来的另一个愿意拿少一点报酬而干同样活的工人所代替。正如马克思在谢基诺试验之前一百年所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②

苏联的新理论家，在想方设法要在短期内建立一支产业后备军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远景规划。K·维尔米舍夫就主张从"社会生产部门"中"平均每年裁减一百万个母亲"，让她们专门"生产婴儿"。③

---

① 马涅维奇：《改进劳动力的使用方法》，1973年第12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7—698页。

③ 维尔采舍夫：《刺激人口增加的方法》，1972年第12期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被裁减的苏联工人已沦落为没有法定生存权的人。一九七一年，研究苏联问题的资产阶级教授马歇尔·戈德曼曾以讽刺的笔调写道，“俄国人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时，还发现有失业补助这一方法。一九七〇年二月以前，俄国人还矢口否认苏联存在失业问题。既然不存在失业问题，那么就无需有什么失业补助了。然而，这种推论是不会使失业的人感到宽慰的……”①

情况的确如此，但这位教授似乎对失业补助问题有所误解。早在一九六九年，马涅维奇就在前面援引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为了使技术进步（迫使工人加强劳动强度的委婉说法）而引起的裁员不致影响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由政府进行某种物质援助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

一九七〇年，巴兰年科娃强调指出：“谢基诺试验再次证明，必须切实执行先前提出的建议，使被裁减工人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得到物质援助（包括定期生活津贴）。”但在一九七三年末，即失业补助制度据说建立三年之后，马涅维奇明确地写道：“为了保证裁减劳动力而又合理使用劳动力，必须采取许多其他的经济措施和法律措施。例如，解决一个久悬未决的迫切问题，即给予被裁减人员以物质援助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②

看来很清楚，苏联的失业者，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者一样，都不会白白地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失业补助，即使象马涅维奇那样内疚至深的“自由派”也不会为此辩护。从某些方面来说，苏联工人的状况甚至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状况更糟，因为苏联官方不承认苏联工人的真实处境。

苏联官方依然坚持认为苏联并不存在失业现象，因为在“社

① 1971年7-8月号《哈佛商业评论》，第160页。

② 1973年第12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

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是商品。这样，失业者就被迫为官方的伪善付出物质代价。

为找工作而引起的人口流动

马涅维奇在一九七三年写的那篇文章中说，被解雇的工人一般需要花二十五天到三十天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然而，这个平均数既包括熟练工人，也包括非熟练工人。前者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后者的“后备”队伍则庞大得多。农村出现类似的资本主义复辟后，“过剩”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产业后备军人数大大膨胀起来。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全苏联大约有一千六百多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其中适龄工人有一千三百万人。据苏联学者Ю·尤苏科夫观察，这种情况跟“某些企业和组织从乡村中招募工人”也有关。① 就是说，城市掠夺了农村人口，这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描述的沙皇时代的情况很相象。

除此之外，这种人口流动未必以固定不变的形式结束；相反，似乎人口仍在无法预料地、继续不断地到处流动。苏联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稳定的人口流动”。苏联人口统计专家Л·卢戈弗斯卡娃说：“最近，苏联不稳定的人口流动现象以更密集的形式加剧了。”②

这就证明，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认识到他们的劳动力已变成商品，为了寻找好一些的，或者至少是压迫轻一点的出卖条件，他们到处流动。假如人们被迫剥下自己的皮拿到市场上去的话，他们至少想卖个最好的价钱。不言而喻，从人口流动所造

① Ю·尤苏科夫：《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972年第12期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② 1972年第8期苏联《计划经济》杂志。

成的生产损失来看，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据《计划经济》杂志发表的数字，仅仅在工业系统，一九七二年就因此损失了价值约四十亿卢布的产品。”①

由于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成交”频繁、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据试估工人调动工作的人数和次数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专门著作透露：国民经济各部门全体职工中，调动工作岗位的人数，一年内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一。平均说来，一个工人在同一个企业中的工作时间只有三点三年；平均一个工人在一个地区工作了十二到十五年后就要迁到别的地区。该书的作者估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每年都有几千万人调动工作，调动工作的总人数超过一亿。据概算，由于发展生产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而调动的事例还不到总数的一半。”②

总之，尽管苏联的经济学家和政界发言人都不承认苏联的劳动力已经变成商品，但事实足以证明问题的存在。根据最近苏联的社会调查来判断，苏联工人对官方宣传机器说他们是“社会主人”的胡诌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一九七四年在雅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对工人家庭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父母都是工人的家庭里，不愿子女进工厂当工人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在只有一个家长是工人的家庭里，不愿子女当工人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对中学生的择业志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钢铁工人占第二十八位，镟工占第五十九位；拖拉机手占第五十一位，木匠占第六十八位。③

又曾对乌克兰伏罗希洛夫格勒的一个大型机车厂十八岁至

---

① 转引自1974年9月27日《北京周报》，第34页。

② B·C·涅姆钦科：《劳动力流动率》，1974年第1期苏联《莫斯科大学学报》（经济学版）。

③ 引自1974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二十五岁的工人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其中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对工资收入不满，百分之七十一对工厂设备不满，百分之七十对工厂的卫生条件不满。根据调查指数来看，这种不满率比前五年提高百分之十八。工人特别不满意所谓“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制度。有一个工人说：“这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另一位工人说：“它不过是空中楼阁。”再有一个工人问道：“竞赛是啥玩意儿？不是你必须完成的定额又是什么？”①

（未完，待续）

① 引自1973年12月2日《纽约时报》。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读一点匈牙利事件的史料

晓　阳

本期刊登的两篇有关匈牙利事件的文章，一篇是苏联人写的，一篇是美国人写的。两篇文章多多少少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匈牙利所犯下的血腥的反革命罪行，介绍了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可以当作史料有批判地阅读。读罢有关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史料，我们一定会联系到不久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两起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各不相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

首先，这些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直接产物。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也看得比较分明。他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一些罪行的谴责，加强了匈牙利反斯大林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的力量。"但是，那位苏联人却把这一点隐瞒了。事实是，当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并且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修二十大上提出一整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抛出臭名昭著的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咒骂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就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匈牙利事件是这些逆流中的一股。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则是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头子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如

果不是邓小平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就不可能发生如此疯狂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

第二，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走资派还在走。在匈牙利事件中，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上下呼应，内外配合，手执屠刀，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十天之内就屠杀了一千七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居民。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剥削阶级并没有被消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必然沉渣泛起，兴风作浪。天安门广场事件何尝不是如此？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老资产阶级蠢蠢欲动，而且那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反革命气焰更是嚣张。

第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事件的总头子。匈牙利事件中，反革命暴徒们为纳吉欢呼，要纳吉重新上台。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大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向邓小平大表“忠”心。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决不。**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它说明，修正主义头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总后台、总代表。

第四，两次反革命事件中，它们举的旗帜，呼的口号，又多么相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分子，一方面，恶毒咒骂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推倒斯大林的铜像，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抛出了一套以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为主要特点的修正主义纲领。有的反革命分子，抢劫了国家的银行和仓库，就沿街散发纸币和布匹，口号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恩典！”有的反革命分子占据了工厂以后，许愿给工人提高工资百

分之一百。当然，这完全是骗人的烟幕。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方面用隐晦曲折的语言，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叫嚣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秦皇的封建社会”，猖狂地要降下五星红旗；另一方面，也是举起唯生产力论的破旗，要为他们那个“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装出一副为国为民的样子。这一切，不过是袭用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老谱罢了。

两起反革命事件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根本的条件是不同的，中国不是匈牙利。如果说，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寿命虽短，还被抬出当了十天总理；那末，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小撮亡命之徒妄图推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充当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则只能加速他们以及他们的总后台邓小平的覆亡。

匈牙利事件

〔苏〕B·列昂诺夫

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吸引了全世界舆论对该国的注意。布达佩斯和其它城镇街道上所发生的事情，使匈牙利人民的忠诚朋友为之不胜悲慨，也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只有和平民主的敌人才是幸灾乐祸的。国际反动派试图要在人民的不幸和遭难中捞取政治资本。

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拉科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既是无力，又是无意要作任何大的改组。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宣称整个领导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听不进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员和人民都产生严重的不满。

拉科西和格罗的反列宁主义领导作风，使党的领导和党员之间、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工人阶级和其同盟者农民之间以及党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条条鸿沟。

以纳吉·伊姆雷和洛松奇·格查为首的反对集团在发动十月事件以及造成悲惨局面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们错误地把他们的批评从党内搬上了大街，使反动分子有机可乘。结果是他们的批评矛头不再针对拉科西和格罗，而是破坏党的威信，并攻击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纳吉及其集团没有能提出改正错误的积极计划，只是攻击党而又不同反动分子划清界线。他们的批评使反动力量欣喜若狂，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发动反革命。

匈牙利国内外，特别在西德的霍尔蒂法西斯分子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在准备和发动反革命暴动中是决定性的力量。反革命的目标是要恢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这是他们自被推翻之日起从没有放弃过的目标。

但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它们是有着更大的目标的。

国际帝国主义插手匈牙利事件以及它在准备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过去十二年，它的"美国之音"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对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煽动从未停止过。

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国际帝国主义所扮演的可耻角色。在十月事件前好几年，随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起逃往西方的霍尔蒂军队和宪兵残余分子都集中在西德，他们被安置在兵营里，供应他们制服、武器，加以训练并给以美元俸饷。帝国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在欧洲产生一个新的战争温床。

匈牙利在十月二十三日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参与十月二十三日事件的有各种力量，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和意图。可是事情一开始，性质就很清楚。

虽然反革命长期地并谨慎地伪装着，但在叛乱一开始，它们就很有组织地参与军事行动，并有意识地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

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在布达佩斯武装叛乱开始之前已很清楚。在学生示威游行时出现了反动口号和标语："打倒红星"，"不用'同志'的称呼"，以及其它。

在二十三日晚，地下反革命领导人把事前组织好的一批批武装人员派遣到布达佩斯街上。这已是目标针对人民民主共和

国及其机构的武装叛乱了。

反革命分子是事先有组织的。阴谋者是有其理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他们为政变布置他们的力量，一批批人接到指示要夺取重要的军事和政府大楼，例如，火车站、电台大楼、飞机场、兵工厂等等。出现了反革命报纸和传单。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明普蒂红衣主教、塔卡奇-托尔瓦依伯爵、艾斯泰尔哈吉伯爵以及其他人都在电台上讲话，公开叫嚷要恢复资本主义。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反动派为争取人民而用的民主字样不能欺骗世界舆论。甚至资产阶级报纸在一开始也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为了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试图利用人民不满情绪的一次尝试。

西柏林的《柏林晨邮报》在评述布达佩斯十月二十三日事件时，公开地报道了游行时敌视共产主义的人对人民民主制度所说的挖苦话。法新社于十月二十四日的报道中说，有不少"对资产阶级表示支持"的人参加了布达佩斯的示威游行。

为了及早镇压目的在于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地下反革命的反人民活动，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出动根据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打电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电文如下："我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要求苏联政府出动驻在布达佩斯的苏联部队，帮助我们制止骚动，迅速恢复和平建设工作的秩序和环境。"

当然苏联不能拒绝一个友好国家要求帮忙的请求。苏联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的秩序很快就恢复了。几天之后，在十月底时，苏联政府意识到苏联部队再留在布达佩斯会使形势更紧张，于是根据纳吉政府的要求，发出命令将部队退出布达佩斯。

事态将怎样进一步发展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纳吉政府的态度：一方面是看它是否能有力地并迅速地满足劳动人民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是看它是否能很快地解决掉反动派的反人民反革命活动。劳动人民盼望纳吉政府将制订明确的改正错误的计划并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无用的纳吉政府的迅速向右滑，为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大开方便之门。纳吉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同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休戚相关的问题，反而非法地立即废除了华沙条约。它号召人们要抵抗苏联部队，要求联合国插手干预匈牙利内政，支持反革命党派的活动和暴行，还宣布要有多党制，这是不折不扣地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纳吉政府的自相矛盾和两面派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匈牙利会有那末许多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社团，它们在全国或在不同地区都自称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些委员会中有许多负责人是要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真诚的爱国人士，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委员会”是同人民利益毫无相同之处的。

许多“委员会”认为，提出一大串政治要求以及用几乎是最后通牒的形式把它们支持政府的条件提交政府是它们的义务。

在提交政府的要求中有：取消各阶级差别，确认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一切政党的自由，请求联合国干预匈牙利内政，等等、等等。

尽管纳吉政府作了种种让步，反革命分子清楚地表示他们是下定决心要向它算账的。根据合众社报道，叛乱分子中的一个领导人在十月底声称，他们“决不会承认纳吉政府”。他说：“我们所要的是包括社会党人和全国各党派在内的广泛的联合政府。”虽然在十一月初，纳吉又改组了政府，几乎把所有的共产党

人担任的部长全部撤换了，但是，反动派要求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在所谓民族委员会的纲领中有一条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说的："我们不承认目前的政府。"

纳吉政府要走的方向以及在政府中哪一种政治势力将会占领导地位，这可以从反动的逃亡在国外的人所表现的不寻常行动中衡量出来。在那些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刊载了形形色色业已垮台了的流亡的匈牙利政客的各种声明。为了逃避匈牙利人民对他的正义惩罚而逃往西方的年老法西斯独裁者霍尔蒂也挤在其中大肆叫嚣。纳吉·费伦茨、瓦尔加·贝洛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制度的卫道士在为叛乱分子效劳。在维也纳组成了一个"匈牙利委员会"，目的是援助叛乱分子。几世纪以来一直压迫中欧国家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后裔奥托·哈布斯堡，从前的法西斯首相贡伯什的儿子以及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从阴沟洞里爬了出来，鼓励反革命暴乱。

国内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也蜂拥而出，准备夺权。过去在匈牙利拥有几个地区土地的头号大地主艾斯泰尔哈吉伯爵也在布达佩斯出现，他大言不惭地宣布了他的长远政治规划。诚如《真理报》记者所报道的那样，艾斯泰尔哈吉曾打电话给驻布达佩斯的一些外国使馆并讲了大致如下的话：

"我是艾斯泰尔哈吉伯爵。我已回到了政治舞台上来，现正在布达佩斯，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势力完全恢复，我的地产归还。我希望我将成为政府中的一个成员。如有需要，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谈谈对你们有兴趣的匈牙利事情。"

在十一月初，匈牙利持续地谣传红衣主教明曾蒂将重返政治舞台；甚至说，红衣主教将担任政府首脑。十一月三日在电台上的一篇政纲演说中，明曾蒂把人民民主制度描绘为一种"被推翻了的制度"。他说，新制度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

十月二十八日，布达佩斯电台广播了纳吉的一项命令，号召政府军立即停火。这样，苏联军队经匈牙利政府的要求而撤退之后又下达了停火命令，反动派进行血腥暴行的绿灯就此大开了。在这之后，长期密谋要对爱国人士进行报复的反动阴谋者要发动白色恐怖难道还能令人惊奇吗？

白 色 恐 怖

法西斯分子所发出的要对支持人民民主制度的人进行镇压的号召，是白色恐怖的信号。十月二十九日强占《自由人民报》编辑部的武装匪徒发出公告，宣称要迫害共产党员和国家保安工作人员。反革命匪帮的头子们发出如何"猎寻"牺牲品的各种特别指示，通知要仔细地挨户搜查。组织了特别小组，负责在党员干部所居住的公寓门上做出记号以便凶手们能来干他们的卑鄙勾当。

十月三十日，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和捣毁党政机关的行动开始了。坐落在布达佩斯第七区的党委会首先被捣毁，然后反革命分子围攻坐落于共和国广场的市委大楼。暴徒们扫射大楼后，冲了进去，拿党的工作人员和保安工作人员来报仇泄恨。

下面就是在毫无道理的暴行下死里逃生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所描述发生的情况："我是在二楼。当我被人抓住，拖到底层时，我看到匪徒们在走廊里杀害和踩踏党员们。匪徒中有一人说，让这个老妪走开。在我下楼梯时，我的背部受到枪托的撞击。

"一个党员军官被倒吊在大楼外一棵树上。绳子断了，匪徒们就打他。虽然他已死了，还把他第二次吊起来。我看到匪徒们绕着一个工人的尸体跳舞，同时他们把党证插在另一个牺牲

者的嘴里。”

肆无忌惮的匪徒整批地屠杀工人、职员和一切作出抵抗的人。中世纪和希特勒独裁下的黑暗时代又回来了；反革命分子捣毁了书店和图书馆，放火烧了成千上万册书。有些人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凑巧穿了为凶手们认为是国家保安工作人员穿的黄皮鞋。下面是碰巧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在匈牙利访问的罗马尼亚医生代表团领导人V·尼古劳医生的叙述：“当时，反革命力量在纳吉内阁纵容下进行行动时，我们正在布达的中央体育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我们就是在那里目睹了匈牙利首都的流血事件。被反革命匪帮吓坏了的人民，逃进医院避难。所有医院，包括我们这个附属医院，住满了请求红十字会保护的人。但是即使是这种国际仁慈的象征，都不能营救人民免受疯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屠杀。”

尼古劳医生接下去说：“我们看到一所产科医院被暴徒野蛮地捣毁了，还看到了许多被他们捣毁了的医院。我们代表团所在的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想去帮助受难人民，装备了一辆救护车去抢运街上负了伤的人。救护车在一次出勤时没有能回来——抢救负伤的爱国人士的医生、护士被反革命分子的枪弹打中了。”

那时正在布达佩斯的保加利亚记者玛丽亚·日夫科娃在《工人事业报》上写道：“对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真正的法西斯进攻和白色恐怖，是在苏联军队撤离该市时开始的。反革命匪帮野蛮地杀害了党员、国家保安工作人员、真正的爱国人士和工人。共产党员的家被围攻，全家被毒打。”

世界各报刊登了许多白色恐怖的照片——这些照片向世界暴露了法西斯匪徒的滔天暴行。在《新德意志报》上刊登的照片，有一个凶手——看来象是完全丧失了人样的人——把一个负伤

的中尉从医院病房拖出来，倒挂在树上。在同一报纸上，另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横在地板上。从墙上溅满的血迹可以看出匪徒们虐待受害者的情况。后来，他们把刺刀刺入手脚已被肢解了的受害者嘴里并把他的头钉在地板上。

在匈牙利的这些日子里，白色恐怖猖獗的情况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有描述，而且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也有报道，尽管他们称呼霍尔蒂法西斯罪犯为“自由战士”，以掩盖真相和为之辩护。例如，在十月二十九日的《纽约时报》上，特派记者霍默·比加特对于在莫松马扎罗瓦尔地方迫害爱国人士的情况发出了下述报道：一个爱国人士为匪徒逮捕后，“被扔到街上，踏成碎块”。另一个被叛乱分子打伤的爱国人士，“据目睹者说，是昨天早晨从医院拖出来的，被倒吊了起来，断气后放下来，遭到了一批暴徒的践踏”。第三人的情况是，试图逃避迫害者的毒手，从窗口跳出，却被这批屠夫逮住，“践踏致死”。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特派记者巴雷特·麦古恩引用一个布达佩斯反革命头子的话说，“‘许多无辜者’已经成为反叛者手中的牺牲品。”

《纽约先驱论坛报》于十一月一日在另一篇关于匈牙利的报道中说道：“盗窃分子终于无人管束了。今天他们可以定心地在布达佩斯东游西荡，猎寻迄今为止未被吊死的共产党保安警察。”

《法兰西晚报》记者米歇尔·戈尔代那时正在布达佩斯，他承认的情况特别重要。戈尔代描述了暴行和法西斯分子如何迫害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人士。他写道，“这些人数以百计地被杀害，被倒吊着，被鞭打。”戈尔代还说，“最反动的和赤裸裸的法西斯分子公开地流露他们的反苏情绪。新释放的红衣主教明曾蒂在电台上讲话，在报上写文章，好象他是国家的政治领导

人。……纳吉政府是完全被那些过去同霍尔蒂政权有联系的政客们的鼓动所左右了。”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这批发狂的匪徒，对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是并不保守秘密的。相反，他们还洋洋得意地谈论杀人和集体迫害的细节。在十一月初，布达佩斯出现了许多报纸或者可说是新闻传单。这些小张传单，大约是一般报纸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大小，报上的文章是由霍尔蒂分子、以前的地主或工厂主撰写的。从这些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批法西斯匪帮所承认的流血恐怖泛滥的情况。

在这些报纸中，有一份名为《匈牙利独立报》的，有一个具名K.A.的人描述他们是如何吊死受害者的。这篇文章说，“那个人同他的四岁的白发儿子从一幢起火房屋的地下室逃出来……但他没有逃掉……他被倒吊在树上好长时间，满脸是血……小孩则吓得失去了知觉。……”

反革命分子尽一切可能煽动人民反对苏军，抱着这样的目的，于是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挑衅。例如，苏军波列塔叶夫中校说，当苏联坦克开近时，法西斯分子就向一群平民开枪，以便使苏联坦克人员要对伤亡负责。

暴行事件可以无限止地列举出来。但是所引的事实已足以对匈牙利事件的倾向有一种准确的看法。

谁要对反革命在匈牙利所犯的罪行负责？

对匈牙利所发生的可怕的流血事件，人们应如何加以解释呢？

许多事实证明，如果反革命力量没有经过仔细的准备，如果没有蓄谋已久要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法西斯暴动的外国煽动

者，那末，匈牙利事态发展的性质将完全不同，并且也不会造成流血。

西方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很直率地说，匈牙利事件是国内外反动派长期作了仔细准备的。国际反动派和匈牙利地下反革命有密切联系一事，可以从瓦尔加·贝洛的讲话中得到证明。这人以前曾任匈牙利议会的议长，现在是在美国的匈牙利反动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当他从欧洲回华盛顿于十月二十三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说匈牙利的地下力量已把事件的情况告诉了他。瓦尔加预言，在最近的将来，匈牙利政府会有重大变化，红衣主教明曾蒂将被释放，等等。瓦尔加的消息如此惊人地灵通，这就表明地下反革命活动是由国外某些人所指挥的。这一情况，从美国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的谈话中也是昭然若揭的。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对匈牙利事件“事先早就知道了”。

谁不知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在美国长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动逃亡者组织，例如“匈牙利民族会议”、“美国匈牙利人联盟”等等？谁不知道，这些组织的目的是要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最后，谁不知道，这些组织是受西方国家的政府支持的，大多数是完全由这些国家维持的？

美国对一切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行援助，已经由国会作了法律规定，并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列为官方政策。通过这样的法律（这是国家实践中史无前例的），使美国政府得以拨出一亿美元作为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用。这项法律规定这笔钱是拨给特别选定的(!)现在居住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它国家的人，还有从这些国家或地区逃出的人；也可用于招募这些人加入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或

用于其他目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公开号召要"解放"人民民主国家，换句话说，就是要推翻政府，发动内战。

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欧洲自由电台"带来了许多苦难。多年来在慕尼黑的这座安装在东欧国家邻近的功率强大的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匈牙利语广播，充塞太空，疯狂地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发动武装暴动和进行恐怖行动。这里是资产阶级报纸《法兰西晚报》驻匈牙利记者所谈到的关于这一电台播音的情况。他写道："我们也收听慕尼黑欧洲自由电台的广播，不但这一电台拚命号召人们起来造反，加上它的其他节目都造成了很大的祸害。"

法国记者不仅是凭个人观察，而且是同匈牙利人谈话后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还说，"在过去几天里，许多匈牙利人对我们说：'这些广播造成了许多件流血案。'"

这里是德意志通讯社所谈的关于这些准备工作的情况。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西德领土上组成了从匈牙利逃出的霍尔蒂和萨拉希分子的各种组织。在整个战后年代中，这些组织共有成员数万人，就是由所谓"自由欧洲"委员会所领导和控制的，而这个委员会的后台则是美国的某些集团。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前不久，这个委员会以及上述的在西德领土上的种种匈牙利法西斯组织开始狂热地进行活动。纳吉·费伦茨（早先的匈牙利总理，一九四七年因参预反共和国的阴谋而被撤职）从美国坐专机到西德。随同纳吉一起去的有埃克哈特·蒂博尔，他是前霍尔蒂上尉军官，现在是"美国匈牙利人联盟"军事部的领导人。

德意志通讯社接着说，在西德的匈牙利逃亡者中都知道纳吉·费伦茨和随同他一起的人曾同各逃亡者组织的领导人进行

秘密会谈，派遣人员、运送武器和递送宣传品到匈牙利等问题都在会谈过程中讨论了。所会谈的事是准备在匈牙利进行军事政变，这一点从“匈牙利五将军会议”（各逃亡者组织的最高军事团体）也参预了谈判一事来看是一清二楚的。驻西德的美军代表杰克逊少将也参加了会谈。

“五将军会议”中的一个成员申伊·胡戈，以前是霍尔蒂军的上将，他告诉会谈参预者说，约有一万一千名逃亡者受了充分训练并有武器配备，随时准备接受“军事使命”。杰克逊少将通知与会者说，运输匈牙利部队所需要的援助，包括飞机和卡车，可以立即提供。

参加会谈的人对这些匈牙利部队的准备情况的报告表示很满意，他们通知尤斯蒂·埃米尔将军，要他为逃亡者组织向联邦共和国政府表示感谢。会后，纳吉·费伦茨动身前往奥地利，核实把逃亡者部队转到匈牙利的准备工作——这些部队是集中在萨尔斯堡、格拉茨和林茨。埃克哈特·蒂博尔则为了同样的目的前往法国。

多年来，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镇是准备在匈牙利进行武装反革命的主要中心之一。自从美军占领萨尔斯堡后，它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各匈牙利逃亡者组织的中心。成千上万的带着美国传单的号召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气球，就是从萨尔斯堡放出来的。这里也有由美元维持的所谓“匈牙利办事处”。破坏者、武器、弹药都是从这里送往匈牙利的。

对目睹者来说，匈牙利事件一清二楚地是一次准备得很好的反对合法政府的军事行动。美国合众社记者于十月二十五日报道说，显然叛乱者武装得很好。这标明训练有素的并且武装了的地下力量，显然是在利用匈牙利日益增长的骚动来打击共产党政府。

另一个目睹者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在同一天报道说："叛乱分子是由军事策略非常精通并且很有经验的人领导的。"

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准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是蓄谋已久的事。在准备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西方的一些特定的集团，而地下反革命力量只是在等待进行军事行动的方便时机。

在事件爆发之后，地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煽动者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霍尔蒂政权的支持者、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敌人都从世界各地涌向匈牙利。西部边境在若干时间前已疏忽地放松了安全措施，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外国特务便于潜入，而在叛乱的头几天，西部边境的门户对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开得更大。当白色恐怖在布达佩斯和其它城镇嚣张一时的时候，人们可以碰到大批主要是从西德和奥地利招募来的武装匪徒。

在白色恐怖时期，西德的匈牙利逃亡者组织特别活跃。他们召开各种会议，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募集经费。

在萨尔斯堡的匈牙利逃亡者中心，这时也加紧了活动。根据奥地利的《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消息，萨尔斯堡中心从准备活动转向直接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了。所谓的"匈牙利办事处"采取紧急措施遣送"难民"（霍尔蒂政权的支持者）进入匈牙利。在萨尔斯堡火车站，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人自称是前往"布尔根兰去工作"的。这份报纸接着说，这种"工作"的性质可以从这样的事实得到了解，在边境有讲英语的人接待这些"工人们"，并把他们送进匈牙利。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建立了维也纳-布达佩斯"空中桥梁"，向匈牙利居民供应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物品。实际上，这座"桥梁"被广泛利用来运送武器、弹药以及霍尔蒂官兵。十

一月二日，在布达佩斯检查了三十架飞机的通过这座“桥梁”空运来的货物，十一月三日检查了七十架飞机的货物，发现红十字会运送的上面标着“药品”字样的箱子也装着武器。

《新闻报》馆老板F·莫尔登的声明，也可以证实叛乱分子同西方国家有密切联系。根据这一方面的消息，叛乱分子曾“起草过一份迎接西方伞兵的详细计划，并把它送交了外交使团”。

地下叛乱分子的领导人还打算要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奥地利同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领导人中的一个告诉合众社记者说，要向西方国家请求援助的代表团“将在十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晚到达奥地利的尼克尔斯多夫”。据合众社的人说，他是同一群德国游览者一起搭乘美国汽车，在中午过后不久越过边境的。他说他是到萨尔斯堡去同匈牙利逃亡者领导人会面。他没有讲起领导人的名字，也没有说他是如何会同他们建立联系的。他说：“今天或明天，我们的正式代表团即将到达，然后将正式请求西方政府给予援助。”

因此，对支持反革命逃亡者，对匈牙利的流血，谁应该负责呢？

首先，匈牙利事件的一切责任应由美国帝国主义集团负责。甚至某些美国报纸在评述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宣告失败时，都不得不承认某些外国集团对煽动匈牙利的流血事件要负重大责任。例如，《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曾斥责了美国煽动者，说他们在匈牙利地下反革命分子中煽起了“假希望”，并且不论宣传搞得多好，宣传给人的印象却是美国佬即将来了。

在反革命暴动垮台后，许多逃往西方的暴动参加者公开宣称，在拿起武器时，他们都坚信许诺的军事援助即将来到。他们中的一个对《每日新闻》记者直截了当地说，是强大的美国驱使

他们这样做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报道用的是这样一个标题："匈牙利叛乱者称，他们为西方宣传引入歧途"。该报道接着说："到达这个国家的匈牙利叛乱者的思想中首先想到的是对西方大失所望。"

如果特定的西方集团不津贴和不支持匈牙利的地下反革命，如果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包括其喉舌之一"自由欧洲"电台不发出武装叛乱的号召，如果在反革命猖獗时，叛乱分子没有得到国外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包括军事上)的支持，那末悲惨的流血是不会发生的。

(摘译自一九五七年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事件》一书　唐雄俊译)

关于匈牙利事件

〔美〕斯蒂芬·D·克尔特茨①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对过去没有认识到匈牙利战后社会政治力量及事态发展特点的各界人士来说，是一次意外的事件。其实，它是有着特定的原因的。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在苏联出现的政治上的“解冻”和动荡，对多瑙河畔事态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马林科夫执政时代，匈牙利共产党政策的倒转，比较其它受苏联支配的国家更为激烈。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意识到匈牙利有进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一九五三年六月，苏共领导召集了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去莫斯科，把匈牙利恶化的局面归咎于拉科西，并责成纳吉·伊姆雷组织新政府，执行新政策。纳吉取代了拉科西就任总理，但拉科西留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管理党务。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纳吉以总理身分发表第一次公开演说。他承认共产党的政策总的说来是失败了，并提出了“新路线”。他缩减五年计划，作出着重消费品和食品工业生产的诺言，打开集中营，终止流放，一视同仁地释放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还容许农民大规模地离开集体农庄。然而，纳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为时不长。到一九五四年底，拉科西暗中破坏了纳吉的地位；拉科西把“新路线”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

① 作者原籍匈牙利，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曾著有有关匈牙利问题书籍多种。——译者

甚至马林科夫也转而反对纳吉，纳吉只得辞去总理职务，后来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他被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一些罪行的谴责，加强了匈牙利反斯大林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的力量。对拉科西的反对声变得更响了，而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同匈牙利人民之间也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和解。

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作家协会以及后来的裴多菲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三月被批准成立的一个可以开展辩论的俱乐部）和一些学生组织，要求惩办拉科西，责令他辞职，并提出要纳吉·伊姆雷复职。一九五六年三月至六月间，裴多菲俱乐部开展了十多次的辩论，在其中的一次会上，拉伊克的遗孀要求惩办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凶手"。

波兰事件影响着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在波兹南事件的影响下，阿纳斯塔斯·伊·米高扬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要求拉科西辞职。拉科西旋即辞职。格罗于七月十八日取代拉科西，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缓慢的自由化继续进行着。政府受到议会的质问。格罗宣称，一九五五年因"右倾机会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纳吉·伊姆雷，如能接受政府的各项政策，可以重新回到党内。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戏剧般的发展开始了。十月六日，拉伊克和其它几名被恢复了名誉的共产党人（曾作为铁托的代理人而于一九四九年被处决）以国葬礼遇重新埋葬。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中，演讲者谴责了斯大林时代的"虐待狂犯罪者"。大约有二十万人借此机会来反对政府，这是共产党接管以来第一次自发的公开示威。它提供了一种未来事态发展的格

局。几天之后，纳吉·伊姆雷重新加入了共产党。

十月二十二日，布达佩斯的一些学生草拟了一个十六点决议，要求苏军立即撤走，组织以纳吉·伊姆雷为总理的新政府，惩办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的一些领袖，采取多党自由选举制，给予工人以罢工权和最低工资法，还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重新改组经济，遣回流放苏联的人员，以及重新估价匈牙利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事态迅速发展到高潮。十月二十三日，一些学生组织了一次以贝姆将军① 铜像为目的地的严肃的游行，以表达他们对波兰自由运动的同情。后来，二十万以上的人聚集在议会广场，要求纳吉·伊姆雷出场，他最后向人群作了慎重的简短演说。下午八时，当天在会见铁托后回国的、并且显然还不能抓住群众心情的格罗，作了一次惹人恼火的讲话，激怒了示威人群。接着不久，保安部队开火射击聚集在广播大厦前的示威人群。大部分示威者是希望广播他们十六点决议的那些学生。这次流血事件使示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触发了革命。十月二十四日凌晨，布达佩斯街上出现了苏联坦克。

在十月二十四日凌晨的一次吵嚷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委派了纳吉·伊姆雷为总理，并选出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次日，布达佩斯发生巷战，米高扬和米哈伊·安·苏斯洛夫在苏联坦克的护卫下到达了匈牙利共产党总部。格罗被撤销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和五人组成的书记处接替。斯大林主义多数派还保有着党和政府中的某几个关键职位。

由于宣布了戒严法以及据说政府曾要求苏军干涉以恢复公

① 约瑟夫·贝姆(1795—1850)，波兰政治家、军事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失败后侨居外国，曾积极参加1848—1849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译者

共秩序，纳吉在人们中的吸引力在他被委派后不久就减退了。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纳吉被监视在共产党总部，党的斯大林主义核心试图利用他作为工具来保持政权。虽然纳吉后来宣称，他的政府准备进行关于撤走苏军的谈判，到那时，他的含糊其词的声明已不能满足那些在街上抵御苏联入侵者的匈牙利爱国者了。一些西方电台通过广播加以鼓动，于是匈牙利人指望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提供支持来抵抗苏联。

造反发生后，拥有九十万党员的匈牙利共产党几乎完全瓦解。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全国。除保安部队和党上层的核心分子以外，莫斯科在匈牙利是不得人心的。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一些没有组织的自由战士同苏军对峙着。政府作出了给予放弃战斗者以宽大处理的许诺，但没有见效。布达佩斯的军事抵抗中心是马勒特·帕尔上校指挥下的基利亚恩兵营。十月二十六日，造反开始延伸到布达佩斯市外。

最后，纳吉搬进了议会大厦，并开始更加独立地行动了。为了削弱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权力，他于十月二十七日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的新政府。中央委员会宣称，政府即将开始关于立即撤走苏军的谈判。战斗逐渐停止，纳吉解散了人们痛恨的保安部队，废除一党制，允许进行自由选举和终止农业集体化。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再次从莫斯科飞抵布达佩斯寻求妥协办法。根据苏联十月三十日的声明，苏军几乎全部从布达佩斯撤走。

这种有些混乱，但总的说来有利的事态发展，接着就为苏联派新装甲师开进匈牙利领土这样一些令人惊恐的报道所打乱了。十一月一日和二日，纳吉向苏驻匈大使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苏驻匈大使声称，未获悉这些部队的行动情况，于是在十一月一

日，纳吉宣称，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称部长会议一致同意匈牙利中立，并要求联合国考虑匈牙利的局势。

这种事态的变化吓坏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纳吉已被这次造反的反共这一特性冲昏了头脑，他们还意识到，苏联是不能容许匈牙利退出共产主义集团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包括卡达尔在内，离开了纳吉那帮人，不久在布达佩斯失踪了。

当时，从罗马尼亚开来的坦克包围了东部匈牙利的机场、铁路车站和其它战略地点。

十一月三日，纳吉再次改组政府，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分得三个部长的职位，裴多菲(农民)党则分得一个部长职位。国防部长由无党派马勒特·帕尔担任。同日，匈牙利政府代表在议会大厦同苏军统帅部就苏军从匈牙利撤走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因而当天下午就大体上达成了协议。苏军统帅部邀请马勒特和其他匈牙利军队代表去邻近布达佩斯的苏军司令部讨论剩下的技术性细节问题的处理。匈牙利代表出席了苏军统帅部所举行的宴会，马勒特甚至还用电话向纳吉汇报了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他们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据说是苏联保安部队司令伊万·谢罗夫将军在宴会之后把这些匈牙利人全部逮捕的。

同时，苏联装甲师于十一月四日清晨开始围攻布达佩斯。在造反过程中脱逃的明曾蒂去美国使馆避难。纳吉和他的几个追随者则获准在南斯拉夫使馆进行政治避难。

跟在凯旋的苏联坦克之后，卡达尔重新以莫斯科为后台的新政府首脑出现。他指责拉科西统治下不公正的处境使人们感到不满，从而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虽然他谴责了纳吉，他承认，纳吉并不是有意识地帮助反革命的，而且并不排斥纳吉重新参加政府的可能性。他建议，纳吉首先应当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并保证他的安全。三个星期之后，纳吉和他的随从，在匈南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给予安全通行的保证下，离开了南使馆。苏联军队就在南使馆外逮捕了他们。纳吉被押解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提出外交抗议无效。

（摘译自一九六二年美国圣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欧东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斯大林逝世后的事态发展》一书　一兵译）

一九二七年发生在苏联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编者按：下面两篇文章，译自一九二七年苏联《真理报》。这两篇文章揭露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在他们炮制的“八十三人纲领”被联共(布)全党粉碎以后，不甘心于灭亡，利用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纠集一小撮人公然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事件迅速被苏联无产阶级所粉碎；一个星期以后（即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党籍。重温这个事件，联系到不久以前发生在我国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难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内外资产阶级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的；它们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时候，又总是要以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作为其主帅的。邓小平作为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他的反动面目同当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何其酷似乃尔！

反对派反苏维埃的表演

〔苏〕《真理报》

反对派于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上的表演显得可笑、可鄙、可耻，而就其实质来说，是反革命的。一小撮微不足道的家伙竟敢反对千百万劳动群众，企图往协同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庆祝活动中倒进“一勺焦油”，并且硬要群众接受同他们格格不入的反对派的“口号”。这次矛头针对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表演，实际上是一次反十月的表演。只有那些同十月的教导和成果背道而驰、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人，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这是反苏维埃的表演——对这种破坏苏维埃最伟大的节日的企图，不能再有别的称呼了。

反对派分子使出了极端卑劣的手段：据来自列宁格勒的报道，他们在有些工厂里要求工人们“喊着反对派的口号上街”，要不然，就干脆不要参加游行。反对派分子还在莫斯科一些房屋的墙上张贴了他们的“漫画”，在这些画中，联共（布）党被画成囚犯；同时，在工人们高呼“列宁的党中央万岁！”时，有些反对派分子竟然吹起口哨来。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反对派在十一月七日不仅用非法手段印刷自己的宣言，而且把这些宣言在非党的游行者中间散发，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表明他们已走上了绝路吗？

在苏维埃共和国，这条道路是孟什维主义的道路，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派的道路。他们连丝毫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也没有，早就把党性忘得一干二净了。反对派分子事实上已把布尔

什维克党证丢掉，扔到街上，把它们踩在脚下了。

反对派在歧路上越滑越远。他们分裂列宁的党的企图遭到破产以后，就妄想在整个工人阶级和非党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分裂活动。反对派的首领们以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赫列斯塔柯夫才配有的那种轻浮和放肆的态度来玩弄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只有在党内以及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牢固的、坚不可摧的团结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妄图挑拨列宁的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那些在客观上为反革命服务的人的企图。这是孟什维主义的直接继续。

参加游行的非党工人群众给予反对派的袭击以强有力和万众一心的回击，这不容争辩地证明了党有着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支持和信任。反对派十一月七日的表演在非党工人中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非党工人们，和党员工人一样，把反对派教训了一顿。

工人阶级空前有力地表明了自己同列宁的党的团结一致。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反对派分子——大学生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游行时跟着反对派走。所有参加游行的工人象一堵铁墙似的团结在十月革命的口号、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企图发表反党言论的反对派的演说者被禁止发言。游行结束时，反对派手中的标语没有一张是完整的。非党工人们表明了他们也能够捍卫工人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有列宁的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才能获得保证。

反对派十一月七日的表演之虚弱和滑稽可笑，突出地暴露了他们思想的空虚。反对派向非党群众提出什么反党口号呢？说来可笑！只有这样的口号："反对派万岁！""全世界的领袖——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万岁！”“托洛茨基万岁！”这种“政治”路线至多只能引人发笑，理应受到工人们的讥讽。但是，非常遗憾，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明显的。在十月革命游行示威时在场的外国记者们的电报已飞往外国。这些电报成了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最新“材料”，仿佛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解体”了，外国资产阶级可以幸灾乐祸了。

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看到反对派的演说者们站在“巴黎”旅馆的阳台上企图向人群讲话，有谁会感到高兴呢？难道不是那些被禁止参加游行队伍、站在人行道上的耐普曼吗？难道不是这个“第三种力量”在反对派捣乱活动的掩护下，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暗中进行反苏维埃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而如果没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的这种宣传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在国外，资产阶级的警察、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十月游行进行破坏。在我国，这些家伙已经被十月革命所抛弃，而他们的残余也“老实”得多了。在我国，对十月游行示威的破坏是由那些参加由托洛茨基反对派组成的新党的“不够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苏联不是兴登堡的“自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在那儿，可以破坏十月游行示威，可以毒打男女工人而不受惩罚。在我国，工人们不允许有人破坏无产阶级的节日。在我国，十月的节日被看成是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群众自己最重要的节日。在我国，破坏这个节日的企图不可能不在政治上受到惩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十年来领导这个政权的始终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队伍里存在叛变阶级的行为、工贼行为和孟什维主义。

反对派企图通过象十一月七日那样的表演达到什么目的

呢？很明显，那些堕落到阴谋破坏无产阶级游行示威、一贯破坏创造性建设工作的人，正在危害无产阶级的党。

多年来，苏维埃政权和党事实上是在没有他们、没有反对派首领参加的情况下，在违反他们的意志、同他们对着干的情况下，胜利地进行工作的。而工作正在向前发展。苏维埃政权和党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在这些年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激怒了我们的反对派，正如激怒我们公开的敌人一样。

如果反对派再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孟什维主义，那末，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就将把反对派从自己的无产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这样，没有他们参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也照样会坚定不移、所向无敌地朝前发展，正如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队伍在十一月七日的游行示威中不顾一小撮微不足道而又妄自尊大的反对派分子，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地大踏步前进一样。

（译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苏联《真理报》 延枫译）

反对派在游行队伍中

〔苏〕 Я. Р.

反对派的那些可悲的领袖们，妄想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游行蒙上派别的色彩。

一切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了。地下油印机印了许多“新”传单，相应的宣传画也准备好了。“领袖们”分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个区，号召扩大他们的队伍，甚至动员了“对党不满的非党群众的家属”。

反对派分子盖森在列宁格勒说：“号召所有对党不满的非党群众参加到这支队伍里来。请带上你们的家属，妻子、孩子等等。”

“领袖们”把自己的旧画像找了出来，恬不知耻地在像片下面签上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几个字。

这样的画像已经出现在莫斯科几家旅馆的高不可及的阳台上。

反对派分子还企图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们在列宁格勒更是活跃，已经在列宁格勒的一些工厂里散发了署有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和拉狄克等人名字的传单。传单具有极露骨的煽动性，内容为：党欺骗了工人阶级，号召工人们在游行时呼喊反对派的口号。

尽管作了这样的“准备”，尽管反对派这一次的表演十分“激昂”，比前几次更加蛮横无礼，但结果仍是极其悲惨。除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街道上显得十分拥挤，除了游行队伍短

时间地被看热闹的人群阻挡住外，没有出现其他意外事件。

反对派这一次又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和坚决的回击。

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企图在莫斯科“巴黎”旅馆的阳台上发表演说。这个旅馆被游行示威的人们包围了。

“赶走他们！打倒他们！”

许多只苹果和套鞋飞上了阳台。

有几张反对派的宣传画被游行示威的群众在“乌拉”声中撕碎了。在列宁格勒，成千上万张宣传画和口号中没有一张是属于反对派的。

反对派的报告人在工人集会上遭到了坚决的回击。那些恶毒诋毁党的话被震耳欲聋的口哨声和“打倒”的喊叫声所淹没。

在莫斯科大工厂——“镰刀和锤子”工厂、“俄国电缆厂”内，反对派分子也遭到同样的吼声：“叛徒！赶走他们！”反对派分子坐上汽车飞快地溜走了。

强大的工人队伍冲击了走上列宁格勒街头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领袖”被挤在队伍里了。当他们刚能摆脱开队伍，就立即钻进一幢房子里去了。

绝望地冒险进行突然袭击的反对派分子又一次彻底失败了，又一次遭到了坚决的回击。

党和工人阶级将对反对派在庆祝游行中的丑恶的狂妄行为作出应有的结论。

（摘译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真理报》 欣彬译）

一种唱挽歌的气氛

编者按：今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从去年春天开始，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纪念文章；大量的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美国的兴衰过程。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在《美国经验：开国元勋树立的榜样》一文中感叹："我讲这一切时都有着一种唱挽歌的气氛"。

美国《独立宣言》鼓吹的"天赋人权"，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什么货色呢？所谓"天赋人权"，实际上是人赋人权，即垄断资产阶级赋予自己以"人权"，却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广大黑人的"人权"。黑人带着沉重的脚镣，从非洲来到美国，为开发美洲大陆，建设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流血流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骇人听闻的歧视和迫害，是苦难深重的奴役和剥削。《开拓者和移民》一文说，黑人"生活在我们中间，然而不是我们自己人"。美国黑人的痛苦遭遇是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一个极大讽刺。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外，则是"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总是支持着残酷的独裁政权"。"这个共和国公开的和隐蔽的政策，就是把那些藐视自由的政

府，看成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堡垒”。

从本期摘译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国二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从兴起走向衰落的历史。一七七六年，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将被人民所推翻。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二百年来已走并将继续走下去的道路。如果说，美国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还为人类作些好事；那末，当代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完全走向了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垃圾了。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已愈演愈烈，遍及全球，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尤其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尽管苏修的野心很大，但本质虚弱，力不从心，欺软怕硬；经过全世界人民的坚持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衰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第三世纪的任务

〔美〕埃米特·约翰·休斯①

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如同普通的人一样，是在舞台上长时间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力图赢得观众的满意的反应。然而，一个国家，也同常人一样，往往会有不经心地自我暴露的特殊时刻。对美国这个共和国来说，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去年春天在马萨诸塞州庆祝共和国诞生两百周年第一幕揭幕之后发生了。在现场的十五万多具有爱国热情的美国人的注视之下，重演了一七七五年四月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冲突② 和保罗·里维尔那次有名的快马疾驰。但是，这里有一个颇堪玩味的差别。一九七五年的这次疾驰是在中午而不是在午夜上演的。我们今天扮演骑马者的人解释说："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在创造历史，只不过是在做戏而已。"

我不禁相信，日和夜的颠倒，以及"承认是在演历史戏"而不是在"创造"历史，将永远成为对这个共和国目前状况的绝妙对照。还有什么比这种对照能更生动地描绘一个庆祝自己的诞生而对自己最早的那段历史如此健忘的民族？而这样的健忘就它在当前世界上扮演的使人困惑不解的角色和它对自己的认识模

---

① 作者曾先后担任过《时代》和《生活》杂志记者和编辑以及《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现为拉特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译者

② 指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同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译者

糊不清而言，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思想混乱状态通过在波士顿各处的庆祝活动，包括象共和国第三十八届总统那样的权威人士的讲话，都迅速地得到了证明。杰拉尔德·福特来到康科德桥和基督教堂，就他在这个发人深思和节日气氛的时刻的感想发表了演说。他根本没有谈到个人自由或社会平等或种族公道。他只是对在世界各地"处于第一线……的美国武装部队"和"现已延伸到最遥远海岸的美国的海上力量"表示庆贺，以此来庆祝这个节日。真正的情况却是由基督教堂一个年青牧师向听众讲出来的："我们的人民是心绪不宁的、分裂的，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力量源泉和我们的前途目标没有明确的主张和信心。"

而且，这个史无前例的、美国庆祝建国活动的头几天，恰恰同史无前例的、美国在越南遭受屈辱的最后几天碰在一起了。这显得极其不和谐。正当波士顿的演说家们在回顾一七七五年英国士兵的败退逃走时，西贡上空的直升飞机在一九七五年正在匆忙地让败退逃走的美国士兵赶紧离开印度支那。一位当记者的友人在报道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古装戏剧之后，对我讲起了这整个事情的讽刺意味。他说："看着这一景象和想着另一景象，使我深感迷惑不解。过去是我们蹲在土墙和篱笆的后面尽力狙击大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的外国敌人。但现在——在那儿——是他们在狙击，而我们则在大摇大摆地走着。事情似乎颠倒过来了。"他顿了一下，然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妈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任何人可能都没那样聪明，可以道出完整的答案，但是我认为症结所在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一个光辉的誓言。这个共和国的创立者经过深思熟虑，明白无误地打算让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遵守一个双重的誓言。这个誓言就是要保证人们可以在自由中

明智地治理自己，并且要负责号召别的民族起来做同样的事。这样的一个誓言把相等分量的崇高的目的和醉人的美酒混和在一起了。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混合导致世人一再怀疑，美国的生活和行动是反映着一个受到崇高目的鼓舞的共和国，还是只不过是一个处于酩酊大醉状态的共和国的生活和行动。

就现代而言，证据的分量似乎支持这两个估计中较为令人伤心的一个。这个共和国在全球各处所表演的姿态和奉行的政策，看来正在蹒跚地从自相矛盾走向自相矛盾。

从自相矛盾到自相矛盾

这个诞生时就献身于传播具有普遍意义思想的共和国，已变成为一个比任何人更热中于到处销售军火的国家。在过去十年内，年销售量已从二十亿美元猛升到一百一十亿美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国家已供应了约值一千亿美元的武器，使多达一百三十六个国家武装了起来，真可谓不偏不倚到了极点。因此，这个自命为国际和平的保护者的共和国，已使自己成为世界的军火大王。

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这个共和国的旨在捍卫人类自由的战略却不适当地总是支持着残酷的独裁政权。从根本上说，越南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是我们盟友的专制政府而打起来的。从南朝鲜和西巴基斯坦，到拉丁美洲一直到西班牙和希腊，这个共和国公开的和隐蔽的政策就是把那些藐视自由的政府看成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堡垒。没头脑地热中于全球性的双重标准。最近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对任何孤立主义精神最引以为憾的共和国的领袖们，由于这些和类似的行为，使他们自己成为新孤立主义的建筑师。比

如，亚洲的共产党中国的政府已得到每一个大国的承认，但美国却是不在此例。又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都赞成让北越和南越加入联合国，但美国却是不在此例。又如，在欧洲，美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一事同十五个我们欧洲盟国撤走大使以抗议马德里的残忍政策一事是同时发生的。

所有这一切，可以看成是两位开国元勋很早以前就诊断过的两种病毒所造成的混乱。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警告过，不要受种种他称之为"躺在功劳簿上的病毒"的诱惑。托马斯·杰斐逊则曾经写道，"自由病毒"的传染好得很。这个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和国，现在看来严重传染上了第一种病毒，但对第二种病毒却基本上是免疫的。

在一位以"联系"概念（即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作用联系起来）而闻名的美国国务卿当政的时期，所有这些，变得极其清楚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们似乎忘记了有一个历史性的"联系"，就是这个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和它是什么样的共和国这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的、断绝不了的联系。

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在水门事件的创伤和越南事件的创伤之间看到重要的一致性，并把这看作是上述这种联系的一个不祥的象征。举例说，一九七二年指使一些人入侵民主党全国总部去搜查可以连累民主党人的所谓罪证，这较之一九七〇年命令美军入侵柬埔寨去消灭所谓共产党总部一事，究竟哪一桩在政治上更荒唐呢？用白宫的钱收买七个小偷，使他们保持缄默，这较之同一个白宫把越南战争说成是"体面的和平"的胜利一事，究竟哪一种"掩盖手法"看来是更不择手段呢？根据什么逻辑可以说海外的警察国家能够不受一个在国内胡乱滥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的控制呢？一个把这个共和国

自己的公民看成是“孩子”的总统，他又怎么能不把较弱小的国家看成是仆从或走卒呢？

总统和政党制度

这个世界之所以达到如此灾难的地步，其实是反映了在这个共和国内部所发生的灾难。国内走了样的状况是不难加以说明的。因为可以用两种互有联系的方式来描述美国的政治生活：一种是两党制度，另一种是总统制度。严峻的事实是，这两种制度都痛苦地遇到了困难和出了毛病。

可以用一系列人所共知的原因来解释各政党的命运，但是，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下一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共和党的特别令人伤心的命运，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它已愈来愈成为反动势力的俘虏了。两党制的生命力全在于两党相互作出反应，一个党的责任感和力量能够决定性地影响另一个党的责任感和力量；一个党变得昏庸无能就很容易使对方变得软弱无力。到今天为止，以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为首的共和党领导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的向右转。在他任总统的全部时期中，他只有三次令人激动但不一定是令人鼓舞的时刻：赦免理查德·尼克松，大胆地援救马亚圭斯号商船，对纽约市振振有词地进行攻击。所有这三次都被标榜为总统的勇敢行动。然而，所有这三件事只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三次都是对极右的姑息行动。

至于总统这一职位本身，并不需要再一次悲伤地重温它所经历的灾难。我将仅仅回顾一下三十年前提出过的对这一职位要经受严峻考验的一种估量。一九四〇年，作为美国状况观察家的英国学者哈罗德·拉斯基在他出版的关于总统职务的精辟讲稿中，就曾极其有力地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任何政治制

度中，总得有一个寄托信任的地方……美国方案的实质就在于……必须信任总统。”因此，这个共和国本国的大多数人似乎都不禁为之而战栗，这是不奇怪的。

需要一个自我反省的全国性行动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必须重新行动起来，我们必须解放我们自己。”

亚伯拉罕·林肯，一八六二年

林肯对国会所说的这句易于令人误解的简单的话，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依然是保证在它的第三世纪能过多少是安全和有充分荣誉生活的唯一途径。

今天要拯救我们这一特定的文明，关键不在于物质上的、财政上的、军事上的东西，如部署武装部队、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等。我相信，只有牢牢地记住使这个文明得以产生的理想，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成立，就是要表明享有自由的人在他们自己当中和在对待其他民族时，应当如何行动，让其他所有的民族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所借鉴。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放弃那种对军事力量的迷信，那种使越南悲剧成为可能的迷信，但不能放弃政治上的创造力。同样地，我们将不得不令人厌恶地努力重新审查和纠正使这个共和国变成世界最大军火市场的那些措施。

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虚荣心的膨胀和对历史的歪曲将使我们满怀恐惧。一切国家的历史都没有什么一个大国永

远尝不到失败滋味的记录，任何对这样特别的命运的幻想，只能鼓励人们固执地拒不承认错误。这个问题由于马亚圭斯号商船事件而更显得突出了。巴黎《世界报》的编辑只能哀叹说："美国需要这样的胜利，适足以说明美国的国势已下降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应当尽快地也具有这样的认识，即如果我们能认真表现出一种民族谦恭的态度，来抵消我们习惯于担任救世主角色的形象，那末，我们这个共和国将不是削弱而是能加强它的全球政策的说服力。我们不断地向西开发边疆，一度就由警长制定法律和牧师拯救灵魂，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长期担任的角色演化成为几乎是一个民族的习惯。正如这个共和国在现代所表现出来的感情（首先是四十年代对共产党中国，然后是六十年代对共产党越南）所证明的那样，十九世纪经验的发展已使边疆应以西海岸为界成为难于接受的了。越过太平洋，更辽阔的土地似乎还等待着世界警察和杰出的传教士的到来。只有这个自负的看法，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那几年，这个共和国内曾那么激动地发生了关于"失掉"中国的罪人是谁和"失掉"中国的原因是什么的辩论，倒好象整个中国曾经是我们的而现在"失掉"了那样。

最后，在注视着我们动态的世界的面前，如果能正直地和克制地刷新它对一切不同意我们的民主观念的国家和社会所持的看法和态度，这个共和国的面貌和形象还有可能从软弱变成坚强。我们不能硬要这些国家恭顺地追随我们在政治上的做法，我们也不能用隔离政策有效地改变他们的做法。我们也不能硬说自由制度可以简单地装箱运到遥远的地方，输送给其他文明社会。这样做并不能表明，反而会贬低我们对自由制度的信心。我们在越南的冒险，其盲目性是再也无可比拟的了。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在努力捍卫而是在企图创立一个那

儿根本不存在的自由国家。这个共和国一贯地在它喜爱的和它厌恶的暴政之间，在它装作不看见和它表示反对的压制之间，进行选择和歧视，这尤其是不能表明它是热爱自由的。相反地，它可以站出来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这样的共和国，它能公正地遵照同样的道德标准和政治行为对待各处的暴政，不管这个暴政是右的还是左的。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二月号美国《思潮》月刊
钱志坚译）

开拓者和移民

〔美〕本杰明·夸尔士①

美国黑人从自身的经历中，从那“千千万万早已离世的”先辈们的命运中懂得了，二百周年对他们黑人还有着特别的涵义。对黑人来说，二百周年决不只是一个美国全国独自庆祝、自我大唱赞歌的节日。步法整齐的军乐队，安详地坐在彩车上的戴着假发、穿着十八世纪服装的人，签署独立宣言和华盛顿跨过特拉华河的维妙维肖的扮演，这些庆祝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将会激动其他美国人，也将使美国黑人深为感动。

但是，这些壮观的庆祝活动，七月四日晚的焰火，对黑人来说远不是二百周年意义的全部。不管这些活动有着多么的爱国热忱，美国黑人将不会把二百周年仅视为一次沉湎于狂欢的盛会。

由于美国黑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二百周年意义的那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对二百周年将作什么反应是值得慎重加以考虑的。不管是出于多么无意，美国黑人（这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作用如果被贬低了或被忽视了，那末，即将来临的二百周年的纪念和庆祝将会是片面的和被歪曲了的。

把黑人列入我们国家的开拓者之列，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当黑人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象其他那些早年来到美洲的人一

①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摩根州立学院历史学教授。

样，发现这里早就有人居住了。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那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那些后来被称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早在哥伦布之前约一万年就已移居到本半球了。的确，把这些有着优良传统的土著印第安人视为美洲大陆的开拓者，可能是不会有错的。

但是，在那些在哥伦布之后来到美洲的人中间，无论是在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十七世纪初期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黑人肯定都是属于最先到达者之中的。在美洲殖民地的末期，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黑人。

这些新来的黑人是被人用铁链从非洲的西部带到美洲的。可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现在从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中得知，他们对美洲作出了许多贡献。

在殖民地美洲开拓者中，黑人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一七七六年美国成立后移入的数百万人中，黑人却只占很小的比例。十九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涌入美国的主要是那些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八十年代是十九世纪移民的高潮，五百余万人来到了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相对来说，非白种人的移民、包括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移民为数甚少。

从一九〇〇到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五万黑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当初，在这些移居来的岛民中，由于出现了象马科斯·加维那样的知名人士和象克劳德·麦凯那样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使人们对他们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后来定居在纽约的哈莱姆区，偶而也和当地出生的黑人发生摩擦。但是，同他们所共同面对的种族问题一比，这些摩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即使黑人移民为数甚少，美国黑人还是在许多方面渗进了

移民社会中去了。移民们，特别是那些从南欧和亚洲大陆来的移民，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到来所产生的恐惧和憎恨，也面临着种族歧视。一八六〇年以后来到这个国家的那些人，更被认为是生来低下的，不宜同化为美国人，因而受到了歧视。所有这些人都象黑人一样被迫陷于贫困，遭受歧视和社会的排斥。

白人移民虽然也有着他们痛苦的经历，但比起那些当地出生的黑人来，他们所遇到的惨痛就显得少得多了。特别是当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选民和有一些人变得富裕之后，社会对他们也就比较容忍了。他们的后代在进入美国社会的大家庭时也就越来越容易了。

但对黑人来说，事情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们受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一贯的排挤。白人并不是被人硬逼着而是出于自愿来到美国的。虽然他们坐的是统舱，在横渡大西洋时也很艰苦，但是和黑人在从西非到美洲途中所受的极其可怖的境况相比，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纽约的自由神像决不会欢迎黑人踏上这里的海岸。

和白人不同，黑人有着“一望而知的肤色”。在绝大多数白人的心目中，那种肤色就注定要把他们作为门外人而永远固定下来。黑人代代、处处遇到的都是一堵甚至对最顽强的攀登者来讲也是难以攀登的肤色的高墙。即使到了黑人和白人在一起居住的共同生活的时代，那些种族歧视的支持者们，也不认为美国的黑人居民正是美国注定要造就发展的“新人”的组成部分。这种新人乃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的融合物。

“生活在我们中间，然而不是我们自己人。”这句话说出了对黑人的总的态度。这个国家的黑人不仅没有被认为是从遥远的年代起就居住在美洲的历史悠久的居民，相反，他们被看作是祖先崇拜着木头、石头，自己也可能仍然对一些莫明其妙的邪神怀

有景仰之情的一群异国人。不管这个黑人集团的美国化是如何合乎宪法，终究还是被认为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仍然缺少合法性。

尽管对他们采取了这种排挤的态度，但是，对于黑人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在建设这个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却无法加以排除。移民们错综复杂的经历，从有时的痛苦的失望到一些似乎是最不能想象的梦想的实现，确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他们对移居国所作的贡献也是无法加以估计的。在当前纪念二百周年的日子里，移民们的以往历史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值得引起重视的"起码"的历史了，这是可喜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黑人们所赞同的是应对移民作出的贡献给以应有的肯定。纽约圣·菲力浦教堂教长彼得·威廉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四日的演说表达出了黑人的内心的感情。"我们生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可我们只求能象对待外国人那样来对待我们。我们父辈中的许多人为了国家的独立遭受了苦难，流出了鲜血，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想得到象人们对待那些反对独立的人一样的对待。"

把美国说成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黑人当然不会加以反对。他们所反对的是社会的其他成员对于黑人的存在（而且的确对于黑人的生存）所采取的那种故意的一贯的忽视。那似乎是说美国的文化之树从来没有黑色的根，从母干上伸展出来的枝叶中也从来没有黑色的。

二百周年纪念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回顾过去的时刻。但是在我们回顾"那甜蜜的、模糊的往事"时，我们似应注意防止沾上种族偏见。尽管在今天产生了新的有益的多元论，许多欧洲血统美国人仍然对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血统美国人、亚洲血统美国人和美国黑人持有一种歪曲的看法。

美国黑人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革命和黑人争取权力的运动而较为人所熟知了。但是有许多自称对美国历史有研究的人，对此几乎仍然是一无所知的。半个世纪以前，杜波依斯曾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黑人，美国能成为今天的美国吗？"对象杜波依斯那样的黑人问题权威来讲，答案是极其显而易见的。但是总的来说，美国的白人（也有不少黑人，虽然其数目在逐渐减少）对于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黑人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知道得极少。美国的历史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白人的历史。

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纪念二百周年时，除非我们对曾经参与这个国家全部经历中每一重要活动的黑人给予重视，否则，对此问题就不会有正确的理解。要想更好地更全面地懂得美国，我们就必须对历史上的美国黑人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卡德·基·伍德森，一个为农奴而战斗的忠诚的战士。今年是这位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作科学研究的伟大的先驱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他死于1950年）。被人誉为历史学家的伍德森创办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同时担任了划时代的季刊《黑人历史杂志》的编辑。但是他并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停留在历史的奥林匹克山颠上。他坚信已往的历史能为现在提供借鉴，他孜孜以求的是伸张正义，实事求是，借以促成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

从伍德森以后，在教美国历史时，再也不能说美国的历史只是一部白人的历史了。而且，我们也对黑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不只是组成新大陆种族中的一员，不只是对美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的经济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我们国家许多重要的宪法上和政治上变

革的推动者。在美国的所有战争中，他们都拿起了武器，并且一直是我们国家民主和平等思想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是什么驱使黑人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呢？又是什么使他们同一个他们的祖先实际上是被硬逼而来，待他们最好时也不过象个晚娘养的孩子的国家连在一起的呢？而这个国家的白人和黑人在权利和机会方面又是如此的不平等。

美国黑人的这种态度可以从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里得到解释。这种内心里的希望大部是建立在从最早的年代起就在美国宣布的那些理想上的。詹姆斯·奥蒂斯早在一七六〇年就说过："殖民地的人民根据自然的法则是生来自由的，事实上不管白人、黑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的。"黑人们衷心拥护这种天赋人权的理论。这条曾作为独立战争基石的自由准则对于黑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当时都还是奴隶。

独立战争所激起的那些理想将深深地留在美国黑人的心里。一九四二年，在纽约托利区黑人的一次地区性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有一条就表示完全同意"帕特里克·亨利所作的宣言，并且庄严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五年以后，黑人在该城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也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独立宣言决不是谎言"。

一八五二年七月四日，弗利德利克·道格拉斯在纽约罗彻斯特区的一次演说中，告诉在座的白人说："今天七月四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可以高兴，我却得哀悼。"然而，道格拉斯在结束他的演讲时，对美国所负的崇高的历史任务表示了他的信心。他说："从独立宣言，从它的伟大精神里，从美国制度所孕育的无穷的天才里"，他汲取了勇气和力量。道格拉斯所表达的这种感情，在一八七六年波士顿黑人妇女慈善组织为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庆祝会上激起了回响。一位发言人背

诵了一首颂诗，其中有一句是“喔，阿他克斯决没有白死”，这里指的是在一七七〇年波士顿大屠杀中丧生的克利斯帕斯·阿他克斯。

今天的黑人已经不象他们的祖先那样乐观了，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美国的前途仍将抱有一些希望。虽然这个国家里的种族偏见正在不断地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大多数的黑人仍将被阿他克斯所唤起的梦想所迷恋。

如果全体美国人民都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任务缺乏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国家将不是一个值得居住的国家了。这种一七七六年精神，这种从独立战争的理想、目标中继续汲取希望和力量的坚定信念，对一个不是同一人种、同一肤色、建国历史又很短还追溯不到中世纪的国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绝对必需的。在美国，民族团结是可能实现的，但那将是建立在对一系列原则的共同忠诚上的。

如果我国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件事，那末它就是，正象如果没有那种对在法律下平等公正原则的绝对服从，人民将会诉诸暴力一样，那末，如果没有对一系列平等原则的绝对忠诚，美国人民将把他们的忠诚用于那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或者那只对自己有好处的阶级利益上去了。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将永远面临的挑战的根源所在。也许二百周年纪念能使我们消除我们意志上的麻痹，重使我们投身于国家的那些尚未实现的伟大任务中去。

一百多年前博学的埃默生曾说过：“自由是生长很慢的果实。”

当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即将跨进它建国的第三个世纪时，看来园地里应该是果实成熟，收获在望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八、九月号美国《危机》杂志　朱妙南译）

美国经验：开国元勋树立的榜样

〔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①

投身于美国独立革命和创建新美国的那些人是启蒙运动②的产物。他们接受启蒙运动的信念，认为人类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世界上所有的人受同样的法则所制约，凭同样的冲动而行事，为同样的热情所激励，也应享受同样的权利。他们相信理性至上和理性法则的普遍性，认为凡由理性肯定为公正和健全的目标都是能够达到的。他们建立联邦时，就是以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法则为基础的，并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和国家最终必将群起而效法之。

开国元勋们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个树立榜样、提供典范的机会，以便他人得以效法。帕特里克·亨利③相信美国已“为全世界点燃了火炬”。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欣然声称，独立战争是“为将来的千千万万人”而进行的，它将“使自由和启蒙运动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诗人乔尔·巴尔洛④断言，美国的榜样“将使全球振奋，将改善全人类的状况”，他的话也是代表开国

① 作者是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历史学荣誉教授，现正撰写五十卷本的《美国国家的兴起》。——译者

②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所进行的文化教育运动。——译者

③ 亨利（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主张独立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④ 巴尔洛（1754—1812），美国启蒙思想家、诗人。——译者

元勋们而讲的。同样，汤姆·潘恩① 也深信"我们美国人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为期不远了"。潘恩还说："美国的事业是有史以来人类从事的最崇高的事业"。在传播这种福音的人之中，再没有人比托马斯·杰斐逊② 更坚持不渝的了。他在致约瑟夫·普利斯特莱③ 的信中说："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社会而有责任行动起来。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也是为了全人类而在行动起来。"

杰斐逊在辞退总统职位的《告别词》中也表达了这个主题："世界上这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人权的唯一柱石，自由和自治的神圣火炬的唯一高举者，其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从这里出发，火炬将在世界各地点燃起来。……全人类都应该为这个国家的兴盛而高兴，为其不幸而惋惜，把这种兴衰看成是同人类休戚相关的事。"

杰斐逊用他战斗的手写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又重弹了这个调子。这是一封向起草《独立宣言》和创建这个国家的英雄们致敬的信："但愿《独立宣言》对全世界能成为……唤起人们的信号，唤起他们去打碎他们在僧侣式的愚昧和迷信的蒙蔽之下而给自己套上的锁链，享受自治的幸福和安全。……所有的人都已经或正在睁开眼睛，看到人权。在科学之光普照之下，人人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广大人类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个鞍子，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得到上帝的恩宠，穿着装上马刺的马靴，可以随时理所当然地骑在他人身上的。"

---

① 潘恩(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启蒙学者。——译者

②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届总统，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译者

③ 普利斯特莱(1733—1804)，英国化学家、哲学家，晚年移居美国。——译者

值得认真想一想的是，在纪念一百周年和两百周年时，美国人只满足于说些浮言夸语，而提不出什么政策，甚至于还让政策背叛自己所说的话。

创建了一个国家

首先，他们创建了一个国家，这是前人所从来没有做到的，因为过去的国家都只是逐渐形成的。而且他们做到这一点时，并没有利用旧世界的民族主义的一切符号和特征，没有君主、统治阶级、国教、陆军和海军，甚至也没有古老的历史。尤其是，他们把国家铸成共和国的形式，而孟德斯鸠① 曾断言，除小的区域或一个城邦外，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两个政治史上最难对付的问题：殖民主义和联邦主义。旧世界各国根本不知道如何对待殖民地，它们只知道为宗主国的利益而剥削殖民地。新美国生来就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国家，从一开始以及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它就是一个殖民大国，它的腹地向西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最终延伸到太平洋。开国元勋们用的办法极为简单，他们把“殖民地”变为州，让这些州加入联邦，其地位同原有各州完全平等。在这一点上，开国元勋们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但这个世界只是缓慢地、痛苦地，直到今天才懂得了这一点。

那一代人也解决了联邦主义问题。这是一个曾使古代希腊同盟、中世纪意大利伦巴底同盟、海尔维第联邦、低地国家联邦、神圣罗马帝国、英帝国等政治家感到极其棘手的问题。美国人则在不过十年多的时间里议定了恰当的联邦主义原则，缔造了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译者

一个历史上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联邦。

他们宣布，一切政府的权力都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给予的。这一原则虽然古已有之，但从未实行过，而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普遍被接受。被统治者如何能表示他们的同意呢？他们如何能"改换或抛弃"政府和"任命"新政府呢？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地方——或许有几个瑞士的州是例外——制定过民主制度。开国元勋们发明了制宪会议作为建立、改换、抛弃和重建政府的适当工具，也就是说，他们使革命合法化了。同联邦主义一样，制宪会议制已传遍全球。

美国也是第一个使众所周知的政府权力应有限制的原则成为制度的国家。一七六六年时，英国议会还宣称，"在不论任何情况下"，它都有权管束它的殖民地。帝王诸侯有权管束他们的臣民，则是历史上天经地义的事。但开国元勋们坚持认为政府并不享有一切权力，然后他们从事于作出一系列牵制、平衡、限制和禁止的规定，以确保政府行使的权力不能超越人民所授予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想出了一大堆新的办法：成文宪法、联邦制度、三权分立、两院制立法机关、年度选举，而更为重要的是，还规定基本权利为根本法的组成部分，从而保障人民享有宗教、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这是连英国的《权利法案》也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政府权力应有限制这一原则也传到了世界各洲。这一原则并没有征服全球，甚至现在还在到处争夺人心。但自由的地区今天要比一七七六年大，这多少是由于美国的榜样显示了人们是能够建立、也能够限制政府的缘故吧。

因此，这一代人无疑是我们历史上最有创造能力的一批人，他们负起责任创建了一些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制宪会议、成文宪法、联邦主义、各州平等、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实际的

基本权利、司法审查，还有政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制度领域内也有创新。

革命的一代美国人不仅有史以来第一次规定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而且规定了政教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愿信教制。他们还第一次在现代史上正式规定了军人应从属于文职当局的管辖。他们比任何其他西方社会更接近于实现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原则，但他们可悲地没有能把这一原则扩大到包括黑人在内。这里的缺憾与其说是少数领导的问题，不如说是广大群众的问题。值得认真想一想的是，他们的接班人要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是用了暴力的。而且，时间还得再过一个世纪，美国人才真正准备允许黑人享受即使只是表面的平等。

创建是为了子孙万代

开国元勋们所做的一切是受到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鼓舞的。他们不仅对世界各民族而且也对子孙万代抱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之所以进行斗争、计划和建设，这都是为了子孙万代。他们无时无刻不是想着子孙万代的需要。这种关心有时是说过头了的，例如杰斐逊说，要“为我们千千万万代的子孙提供足够的土地”，但这决不就是浮言夸语。汤姆·潘恩呼吁人们支持独立战争时说：“这绝不是一天、一年、一个时代的事情，这场斗争牵涉到子孙万代……千万年后的人们还要受到这场斗争的影响。”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当天写给他妻子艾比盖尔的信中就说：“透过黑暗，我已能看到令人狂喜的灿烂光辉。子孙万代将为我们这一天所办的事而欢呼雀跃。”

华盛顿自己是没有子孙后代的，但他是国父。他在纽堡对大

陆军队的军官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由于你们的崇高行为，子孙万代在提到你们为人类树立的光辉榜样时将会说，如果没有这一天，世界就永远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最后阶段，而根据人性，这个阶段是能够达到的。"

把革命的一代同我们这个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一代相比，过去那种责任感的丧失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们口头上也讲子孙万代，但通过滥用土地和水利等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环境，堆积大量核武器，促进种族和民族之间的仇恨，以及无限制的扩大债务，我们一贯地干的却是出卖子孙万代的事。

革命作为催化剂

美国革命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壮观场面。这一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最为成功的。当时世界各地有些人就立即意识到这一革命将对其他人有深远的影响。汤姆·潘恩是一个不久前从英国移居北美的当时最为活跃的革命家。他能对革命的影响看得最清楚这一点，就他的经历来说，是毫不奇怪的。他说："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于反对暴政而且敢于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自由到处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它逐出。欧洲把它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啊！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在西方世界，美国革命到处都成了催化剂。富兰克林① 从巴黎用可以理解的夸大笔法写道："全欧洲都站在我们一边……

①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 年间出使法国。——译者

这里的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在为保卫自己的自由而进行斗争时，也是在为他们而斗争。”毫无疑问，欧洲的一切自由派人士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独立战争使英国舆论严重分裂，就象越南战争使美国严重分裂一样。但是相比之下，那些反对英国镇压美国革命的人比那些反对东京湾决议①、反对毁灭越南和柬埔寨的人更为直言不讳，更勇于发表不同意见。当时英国哲学家如普赖斯博士、普利斯特莱博士等人都公开支持美国的事业。当时英国一些政治家如查塔姆、谢尔本、罗金厄姆和格拉夫顿等人也都指出进行镇压的战争是愚蠢透顶的。有十九个勋爵在一份抗议书上签了名，抗议发布北美发生叛乱的公告。

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身为中将，却不愿当这场战争的指挥官。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是当时英国陆军中地位最高的将军，他也拒绝当指挥官。凯佩尔海军上将则拒绝在美国海域服役。年轻的埃芬厄姆爵士则通知英王说：“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拿起武器去打美国的同胞。”独立战争，美国的胜利和美国的榜样都大大鼓舞了那些要求改革英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的范围，结束选区的乌烟瘴气状态，推动议会举行年会，虽然这一切最后并未成功。

美国的榜样也感染着其他地方。在法国，杰斐逊帮助起草了《人权宣言》，汤姆·潘恩还参加了法国的立宪会议。意大利的热情奔放的阿尔菲爱里② 也用五首歌颂自由的诗和无数的剧本来庆祝美国的事业。

---

① 指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国会投票表示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议。——译者

② 阿尔菲爱里(1749—1803)，诗人、剧作家，主张意大利统一并建立强大的共和国。——译者

创建了一个新社会

革命、独立、建国和新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树立了榜样，激励和鼓舞着全球进行效法。然而更重要的是美国这个巨大社会经济实验室的活动所引起的影响。这里的场面是不仅有成功的自治，而且有经济上发展的机会，有社会上的平等地位，有宗教上的信仰自由，还有私人自愿结合的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向普通的男男女女开放。杰斐逊在一八〇一年致约瑟夫·普利斯特莱的信概括了这一点。他说："我们不再能说天下没有新的事物。人类历史的这一章整个是新的。我们共和国极大部分事物都是新的。它的辽阔的疆域是新的。席卷这个国家的巨大舆论浪潮也是新的。"使西方世界神往的是，出现了参加这一新事业的机会，即出现了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更为幸运的条件下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

我讲这一切时都有着一种唱挽歌的气氛。我们已不再是一个革命的民族。我们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今天所有一切重大的政治制度都是一八〇〇年前创立的，从那时起，就毫无创新可言了。我们已不再向世界上受苦和受压迫的人开放。我们已不再想到我们的主要是减轻人们肩上重负的使命。而当我们从事于推广我们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就诉诸武力，而不是通过树立道德榜样。但愿重温我们过去的立场、我们过去的成就、我们一度曾经有过的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意义，能使我们回到我们原来所走的道路上去。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二月号美国《思潮》月刊
张仲礼译）

独立：新美国的诞生

〔美〕《时代》周刊

编者按：本文叙述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宣言》产生经过。

星期二早上六点钟，在费城，弗吉尼亚的代表托马斯·杰斐逊望着外面阴暗的天空，然后，注意到寒暑表标示着华氏七十度。片刻，电闪雷鸣，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到九点钟，这个城市已是水漫金山。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将近五十名代表慢慢地挤满了瓦尔纽特街州议会大楼的一楼会议室。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但是眼睛却注视着走进门的每一个人。会议室里非常闷热。呆在这个为防雨而窗子紧闭的房间里，唯一的安慰是紧闭的窗子可以挡住附近马厩里的马蝇不致飞进来。

前一天，对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的独立议案初步表决表明，有九个殖民地赞成，两个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反对，纽约弃权，特拉华内部分歧僵持不下。对于决定这样重大的事件——断绝同英帝国的关系，使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及其二百五十万居民获得自由——大陆会议希望得到实际上的意见一致。由于不团结，任何一点事情都可能损害独立事业，因此，七月二日早晨，代表们是忧心忡忡的。

会场上传说宾夕法尼亚要改变主意。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微笑着走进来。他的殖民地也将赞成独立。纽约

的代表们仍旧等待着自己殖民地里的指示，但是他们将不持异议。剩下的只有特拉华僵持不决。他们的代表一个赞成，一个反对，而另一个因事回家去了。大陆会议主席、波士顿人约翰·汉考克敲打着他的小槌。秘书查尔斯·汤姆森在表决之前开始大声地重读决议案。

这时，外面鹅卵石上传来了咔嗒咔嗒的马蹄声。浑身湿透、溅满泥浆、脸色青灰、面带倦容的特拉华的第三位代表法默·西泽·罗德尼，在从快骑信使那里得知他的殖民地僵持不决之后，星夜兼程从多佛骑马赶来了。他围着一条绿色丝绸围巾，遮盖着他患癌病的下半部面孔；这条围巾一路灰尘污染，几乎变成黑色了。而当罗德尼走进会议厅时，他只淡淡地说："雷雨把我耽搁了。"

于是，不同类型的美洲殖民地终于毫无异议地采取了这一步骤：断绝它们同母国一百六十九年的政治联系，宣布它们"从此成为，而且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独立，象诞生一样痛苦和流血的过程，是一次独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试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在实际上致力于使他们自己在新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富于想象的冒险尝试。波士顿的约翰·亚当斯早已兴高采烈地预言："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在美国历史上将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虽然独立的到来还需要几月甚至几年，但这个星期的事件却突然结束，似乎是令人震惊的。七月二日宣布了脱离英国这件事实。再过两天，七月四日，大陆会议签署了一项特别文件，即阐述殖民地脱离帝国怀抱的许多理由的《独立宣言》。这个日期和这个文件可能在美国人心目中终于会显得比七月二日发生的事件更为重要，因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赋与反叛以哲学基础和正当理由。

然而，这整个星期，美国人庆祝的却是独立这个事实，而不是独立的道理。《独立宣言》当众宣读之后，费城一片欢腾，居民们整天整夜地敲响他们教堂的钟。军队列队向州议会广场行进。滑膛枪依次鸣放，以鸣枪礼庆祝胜利。在这个星期初，独立的消息仅只传到纽约、多佛和特拉华；也许在八月份之前这个消息还传不到佐治亚。在多佛，安全委员会主持一个焚烧英王乔治三世画像的仪式。该委员会主席说："这样，我们甚至连那位不配治理自由人民的国王的影子也销毁了。"在象伊士敦、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小城镇中，人群聚集在当地政府所在地，以三呼万岁来迎接《独立宣言》的宣读。约翰·亚当斯在给马里兰的塞缪尔·蔡斯的信中写道："处于我这个地位，你将会看到大江东去，势不可挡，桥梁已经被冲断了。"

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美国人：新英格兰的渔民、船工和商人，中部殖民地的贸易商和小农，南部的种植园主和农场主，他们是带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理由走向独立的。这些新近联合起来的，从马萨诸塞的缅因岩石海岸到佐治亚的沙丘，绵延一千三百哩。各殖民地之间地区上的差别、猜疑和仇视有时比英国和新大陆之间的敌对还要强烈。以前曾有一幅著名的古老的图画，把这些殖民地描绘成截成几段的巨蛇的身体，这样的描绘几乎不能说是夸大。

两个星期前，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私下写道，他对新英格兰人"在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他们那种卑鄙狡猾的习气，还有那些主要是既无声望又没有财产的劳苦人们所具有的平等主义思想，感到心神不宁。"弗吉尼亚的卡特·布拉克斯顿对于新英格兰人的"民主"倾向也感到类似的烦恼。同时，某些北方人也蔑视依靠奴隶劳动的南方人。全国各地依然存在着亲英的保皇主义的强烈气氛。而在大陆会议内部，也有象宾夕法尼亚的

约翰·迪肯森这样的人，他虽不是保皇党人，却主张同英国和解，坚持认为破裂是不必要的，至少是太突然了。

但是这个时机已经到来。自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事件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类似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那样的激进分子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巧妙地玩弄等待把戏，在群众的感情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背离英王乔治并且不赞成和解之前，不急于要求独立。直到最后一刻，这些激进分子才宣布殖民地人民只要求他们在英帝国内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样，就使妄图诬蔑他们为把人民引向歧途的极端分子的保皇党人无机可乘。塞缪尔·亚当斯劝告说："等果子成熟了，我们再来采摘。"

远在正式决裂之前，在美国人看来很多事态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革命的形势；这也就自然会引起一个新的效忠派出现。去年秋天，美国人对加拿大的侵略，产生了两个政治效果：(1)由于大陆会议经常对这次冒险行径给予理想主义的辩解，自由这个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带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甚至是官方的意味；(2)英国人认为，显然美国人是煽动者，必须予以制止。一月，汤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发出清楚而响亮的独立要求，把乔治三世谴责为"这个大陆最大的敌人"。

潘恩的话是这样热烈，流传是这样迅速，以至于到三月初，大陆会议发现自己落后于人民群众了。它急忙赶上去。三月三日，它派遣康涅狄克的代表赛拉斯·迪恩到法国谈判军援。十四日，它决定解除所有效忠派分子的武装。十九日，它授权武装的民船拦截英国商船。二十六日，它禁止向英国和英属西印度群岛出口。四月六日，它对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开放通商口岸。五月十日，约翰·亚当斯向马萨诸塞的州议会主席詹姆斯·沃伦写道："革命象洪流一样，时时处处向我们滚滚压来。"

自二月以来，就谣传英国正在派遣高级专员到美国来进行谈判。一位有势力的宾夕法尼亚人，当时是乔治·华盛顿的副官长，名叫约塞夫·里德的，向他的上司写道："我的长官，老实告诉你，这些专员比他们的将军和军队更使我感到可怕。如果他们的建议似乎言之有理，而手腕又很狡猾的话，我担心他们将会使我们分裂。"（正如人们现在认为海军上将豪爵士可能已经从乔治国王那里得到谈判的指令。）

到四月中旬，老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告诉一位朋友说："似乎万事具备，只缺'一致赞成'。这件新奇事物（独立）使许多人，包括某些怀疑是否能成功的人，还有那些妄想和解的人感到惊恐不安。但是，鉴于我们的仇恨与日俱增，每天有新的理由希求永久分离，我们的敌人则不断想尽各种适当办法扫除这些障碍，而他们的努力是有所得逞的。"

整个春天，各个殖民地的立法会议都适应形势，采纳了一度被认为是叛逆的那种观点。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曾考虑直接宣布独立，但是未付诸实行。当北卡罗来纳的州议会授权它在费城的代表"在宣布独立时与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协同一致"的时候，北卡罗来纳突破了在独立问题上的障碍。

业主殖民地（威廉·佩恩的后嗣和巴铁摩尔爵士在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仍旧控制着得自英王的大片土地）采取拖延态度。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在大陆会议上争辩说："在我们建筑新房子之前，我们为什么要拆毁旧房子，让我们在天寒日晒风吹雨打中无蔽体之地呢？"但是，在五月十五日，根据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大陆会议建议"凡是迄今没有建立起能够胜任紧急事变的政府"的殖民地都组成新政府。约翰·亚当斯在这个月底曾经写道："中部殖民地从没吃过苦头，也从未接受过教训，因此，他们的态度就有些冷淡……这些业主政府中不仅

有大批的教友派教徒，而且还背着业主利益的包袱，这两者加在一起多少妨碍了它们的行动。"

还是在五月份，大陆会议收到关于英王乔治为了对美国人进行战争雇佣了一万二千多德国雇佣兵的条约复本。这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英国兵是一回事，雇佣德国人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为钱打仗的职业兵，他们的出现使很多美洲人忠于英王的念头一扫而光。

于是最后的行动开始了。新大陆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冲在前头。五月十五日，在威廉斯堡召开的会议上，一百一十二位与会成员一致决定，"指令派往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代表这个殖民地建议那个可尊敬的机构宣布联合殖民地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于是，弗吉尼亚着手建立独立的州政府并开始采纳权利法案。

六月七日，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出并拟定了一项动议："兹决议，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解除它们对英王的效忠，完全废止、而且理所当然地应当废止它们和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

对这项动议的考虑先拖延到八日，又拖延到十日，这天，大陆会议的温和派再把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七月一日。但是，六月十一日，大陆会议指派"一个委员会为实行上述决议准备一个宣言"。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三十三岁的托马斯·杰斐逊、四十岁的约翰·亚当斯、七十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五十五岁的康涅狄克的律师和商人罗杰·谢尔曼和二十九岁的纽约律师罗伯特·R·利文斯顿。

在某种意义上说，由年青的杰斐逊来撰写《独立宣言》是一次意外的政治事件。据一种传说，杰斐逊曾竭力主张这个任务

由才华横溢、斗争性强的波士顿律师约翰·亚当斯来承担；他曾表现出自己是最能论证革命道理的人。据说，亚当斯曾表示反对，理由是大陆会议多数人"讨厌"他这个人，而弗吉尼亚人应该撰写这个文件，因为弗吉尼亚是第一个提出独立动议的，总之，杰斐逊是撰写的最好人选。但是，有人说，只是在约翰·亚当斯几乎无法和那位对独立相当冷淡的弗吉尼亚代表本杰明·哈里森共事之后，作为一个折衷人选，杰斐逊才被提名给委员会的。

杰斐逊是一位谨小慎微、心地善良而又令人敬畏的学者。这位高个子、红头发的弗吉尼亚人是在一七七五年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的，当时他才三十二岁，新近才做父亲。他第一次在费城露面时是乘坐着一辆四轮敞篷马车，并且有两个黑人仆役陪伴。约翰·亚当斯对于杰斐逊在辩论时沉默寡言可能感到遗憾，但是在较小的会议上他发现杰斐逊是这样的敏锐，简直把他给迷住了。他们两人配合得很好：亚当斯在日复一日的辩论中，为独立问题进行争辩，而杰斐逊则在背后出点子并把它写下来。

上个月，当杰斐逊返回人口拥挤的费城时，这个殖民地的最大城市（大约四万人口）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再一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清静一点，他寄宿于座落在市场街和七号街转角上的砌砖工人雅各布·格拉夫新建的三层楼房里。杰斐逊占用了二楼——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在卧室和客厅之间是楼梯和走廊。房租是一星期三十五先令。他外出吃饭。

在六月十一日到二十八日这期间，杰斐逊在自己设计的手提写字箱上撰写《独立宣言》，为此绞尽了脑汁。他起草的这个文件后来经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稍加修改，大陆会议又作了一些更动。这个文件把崇高的思想和巧妙的政治策略严肃地结合起来。它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杰斐逊也不打算标新

立异，无非是那些曾经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所充分发挥的一般概念，若干年来这种哲学思想一直是这些殖民地的一种政治福音。杰斐逊打算要讲的是普通美国人的想法，而不是创造政治理论——无论如何，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杰斐逊要尽可能把《独立宣言》变成他所谓的"美国人民心意的表现"。

杰斐逊以谦恭庄重的口吻，怀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崇高目标，开始写道："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这样，杰斐逊在一开头就阐明，或者说是暗示，脱离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主要设想的。首先，美国人是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政治联系的"一个民族"。他们不是公开背叛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英国臣民，因为他们早已是一个与其不同的政治实体；独立并非是叛乱，而是有点象按照社会契约的规则解除一种伙伴关系，人民本来是根据那种契约关系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的。

在庄严的《独立宣言》的第二段中，杰斐逊详细说明了自然法则的政治内容："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杰斐逊第一次曾用'神圣的和无可争辩的'字眼，后来这一措词有所变动），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与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杰斐逊继续写道，"于是在人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政府损害人民的安全和幸福，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强调合法的权力必定是"正当的权力"这个思

想，从而说明人民有权解除已变成暴君的任何政府。这个思想大部分是导源于英国自己的一六四二年革命和一六八八年革命的榜样——包含着对国王处以死刑和放逐——除此之外，还具有不时发生的流血传统的广泛背景，在这个传统中，英国人曾断言他们有权利反对他们统治者的权力。

杰斐逊的草案曾经过长时间的修改过程，尽管这个文件基本上出自他的手笔。起初，他把他的初稿交给富兰克林。后者作了一二处小小的改动，就把这个文件传给了亚当斯。亚当斯对两处改动又作了一次润色，随后给自己缮写了一份。杰斐逊把草案拿了回来，作了某些修改，再次把它交给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并最后把它交到了五人全体委员会，没有作其他的改动。然后，杰斐逊誊写了一份清稿，没有作进一步的更动，就在六月二十八日把它交给了大陆会议。

七月二日，在就独立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之后，大陆会议进而对《独立宣言》进行考虑。这个议程持续了两天多时间，杰斐逊心神不定地沉默地坐着。为了不失体面，他根本没有站起来为这个文件中的一个字或思想进行辩护；约翰·亚当斯承担那个任务，对所有批评进行辩解。不过，有时批评者是占了上风的。

在他起草的冗长的充满怨气的条文的最后部分，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的杰斐逊却插入一段有点不大合乎逻辑的话，尖锐地谴责国王唆使奴隶贸易，并从而进行"残酷的战争来反对人性和侮辱人的最神圣的生存和自由的权利"。遵照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代表的意见，该段被删除了。在其申诉关于利用外国士兵来反对殖民地一段话时，杰斐逊曾提到了"苏格兰人和其他外国雇佣兵"，这一句话引起了大陆会议中的一二名苏格兰人的愤怒，于是"苏格兰人"的字样从独立宣言中被删掉了。

总之，对这个文件的种种修改，使它变得更为严肃和简练。

然而，杰斐逊作为文件的原作者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挫伤。在最后一周大陆会议休会后，他把他那个文件的原稿的复本送给几个朋友，公然地宣称，他们自己将会看出原稿比最后通过的那一稿要出色得多。在开会期间，老练圆滑的富兰克林一度曾想安慰一下杰斐逊，给他讲了一段关于费城有个名叫约翰·汤普森的制帽商的轶事。汤普森为他的店铺定做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约翰·汤普森，制帽商，定做和出售帽子要用现款"，并在下面画了一顶帽子。但是，在挂这块招牌之前，汤普森把它交给朋友们看，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对这几个字或用语进行一番评论（"出售帽子！"一个人喊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呢，没有人会希望你送帽子的"）。富兰克林说，后来，这块招牌只写上了约翰·汤普森的字样，在其名字下面画了一顶帽子。

最后，在七月四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并宣布"生效"和付印。

约翰·亚当斯在最后一周说："我对这次革命的突然性和伟大意义感到惊讶。英国一向是愚蠢透顶的，而美国则是富于智慧的，至少，这就是我的判断。时间将作出裁决……我充分地意识到为了维护这个《独立宣言》，支持和捍卫这些州，我们将付出辛勤劳动和生命财产的代价。"托马斯·杰斐逊也懂得美国人这场冒险行动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对他来说，"人人都睁大眼睛望着，或者说是注视着人权。科学之光的普遍传播已经把人心向往的真理公诸于世，这就是人类并不是天生当牛做马的。"对所有的美国人来说，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结尾中写道，这是一桩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神圣荣誉"的大事。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美国《时代》周刊主编的纪念美国独立两百周年专刊　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罗马尼亚游记

〔美〕唐纳德·商奈尔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的一个资产阶级记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一些罗马尼亚人民反对苏修扩张主义的斗争情况。

黄昏时分，多瑙河两岸华灯初上。列车从布达佩斯出发了——根据时刻表，当晚就要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由于出了点事故，到次日黎明，仍在匈牙利境内。

清晨，列车才驶进了罗马尼亚。这一带是特兰西瓦尼亚——它是一百五十万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家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加入罗马尼亚版图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市镇具有三重性，以致同一个市镇会同时有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等三个地名。列车整天在穿隧道，走高架桥——单是从克鲁日到布拉索夫之间的二百哩地就驶了六个小时。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高谷上，麦子熟了。农民在又长又狭的地里割麦，有板有眼地挥舞着镰刀。虽然罗马尼亚也有收割机，但在许多地里不仅草料，就连麦子也是用手割的——就象描绘在乡土画中的那般风光。一辆轻快的马车打田边辚辚而过。这马车是十九世纪的；接着，立即出现了二十世纪的玩艺儿——一辆里边坐着党政官员的灰色的"伏尔加"轿车疾驰而过。

午后不久，列车已经到布加勒斯特了。在这个城市里，公

园、湖泊和庭园特多，因此从乡村进入市区就不象其它许多地方那样地显得十分突兀：它简直是把一个个村子囫囵吞下去似的，连同放牧的母牛也原封未动。甚至市中心，也散发着农家气息。这必然使城市化的布加勒斯特人意识到自己的乡土味儿。

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其国境有"橡皮边界"之称。它的版图随着战争和政治的消长而伸缩过许多次：不但是西边的特兰西瓦尼亚，就是东边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也都曾割了又并、并了又割。据一九六八年法国戴高乐总统的随行人员说，总统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之所以只安排在各个城市以及布加勒斯特四郊范围之内，也许就因为唯有这些地方才是毫无争议地属于罗马尼亚的——让戴高乐只到这些地方才是万全之计。

离罗苏边境十哩处，加拉茨联合炼钢厂耸立在多瑙河下游的平地上。由布加勒斯特延伸过来的公路到了离多瑙河入海口十五哩的布勒伊拉港，拐进了郊区沼泽地。在这里，人们才看到加拉茨联合炼钢厂塔楼似的建筑物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亚热带的天空雾霭迷漫。一眼望去，人们还以为加拉茨的那些砖砌的大高炉和高入云霄的烟囱，是许多清真寺和其它伊斯兰寺宇哩。这虽是一时眼花，却也无可厚非：土耳其人确实在这一带统治过将近三百年。到了离加拉茨五哩处，幻觉消散了，人们老远就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一个巨型钢铁联合工厂，向天空喷吐出灰蒙蒙的浓烟和大片赭色镶边的白云，污染着罗马尼亚今日的和昔日的领土。从一九四〇年起，普鲁特河彼岸的大片土地被改名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在罗马尼亚人说来，那地方还是原来的比萨拉比亚——这正是他们同邻国苏联不睦的一个原因。

加拉茨则是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它又是罗马尼亚精心制订

的摆脱苏联控制的政策取得成功的纪念碑。这厂固然不小，但这一点可不是它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唯一理由。匹兹堡或鲁尔的炼钢厂都要比它大得多，厂房周围是工业区；而加拉茨联合炼钢厂的四周却是十九世纪的农村风光，显得很不协调。

这种看法，就是一九六〇年建厂计划制定完毕时俄国人告诉罗马尼亚人的。那正是个闹"社会主义分工"的时代——苏联集团内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得开始以某项最擅长的生产为其专业。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是发达的工业国，波兰和匈牙利也已相当发达；因此，集团内余下来的两个最不发达的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就命该一辈子不发达下去了。近百年来，罗马尼亚的擅长，是打粮食和采石油。在东欧，罗马尼亚是独一无二的稳有余粮和储油量又是值得一提的国家。但是，它的铁矿石年产量却只有三百万吨，没有充分的煤和铁矿石去满足年产四百万吨钢的加拉茨的胃口。

俄国人的说法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同俄国人打交道时，"言之成理"就是"别有用心"。有长期受邻国剥削历史的罗马尼亚人看得很清楚，驯服的代价有多大：不但丢了比萨拉比亚和布戈汶纳（面积相当于美国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两州的总和；人口有二百八十万，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罗马尼亚人），让臭名昭著的那些苏罗合营公司在战后榨取罗马尼亚的脂膏；而且直到五十年代中叶，连国家管理也得完全听莫斯科的：不论是要撤换群众爱戴的罗马尼亚领导人，还是罗马尼亚付给苏联的战时赔款要比东德付的还多。但东德在大战中是敌国，而罗马尼亚则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中已经是盟国了。

加拉茨联合炼钢厂奠基五年后，罗马尼亚终于不理睬苏联的那一套了。它既没吃到匈、捷两国所忍受的军事干涉之苦，也

没有遭到铁托离心后的那场经济封锁的困难。与此同时，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获得了中国的支持，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双方都维持政治和贸易关系，而且还出色地打开了沟通西方国家的渠道，使价值十亿美元的现代工艺引入了罗马尼亚工厂，还把尼克松也引来了——尼克松访问一个共产党国家，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哩。

一九六九年，反共老手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同革命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拥抱时，其讽刺意味在美罗两国记者中，是人所同感的。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表明：齐奥塞斯库要比尼克松更乐于同阶级敌人交往——哪怕是一点儿。他是出于必要才这样做的。要是忠于苏联，对莫斯科唯命是从，齐奥塞斯库本来是可以安逸得多的。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前任乔治乌-德治，都能凭当年的经验为此作证：这条路肯定要平坦得多。但说也奇怪，逼迫他们不走这条路的，恰恰就是苏联。

事情是由于在五十年代，乔治乌-德治经苏联批准而推行的那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在国家处于被占领的气氛中，原有的人民的支持很快就会消失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认识到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改变政策；要么，就失去人民。

六十年代事态的发展几乎是同样惊人。而且，罗马尼亚人肯定是更有把握了。在那十年里，罗马尼亚先是个最忠心的卫星国；继则对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嗤之以鼻，在联合国独立思考地进行投票，在最大限度内退出华沙条约，对被斥为异端的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更不要说是西方政治家了——表示友好；而最重要的则是把同东、西方的贸易从七十对三十调整为五十五对四十五的比数。

希尔维乌·布鲁庚

布鲁庚是罗马尼亚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大使，又是党报编辑、乔治乌-德治的外事政策顾问、作家、教授、抵抗运动战士和党的监察官。作为大战结束时在布加勒斯特的废墟中出现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员，他是同俄国人之间的那场漫长而又艰巨的斗争的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

他说："加拉茨是个转折点。五十年代，我们看到我们的钢产量大约为每年三百万吨，就讨论了是否应该提高产量的问题。机床工业是我们计划的关键，也是我们是否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关键。为了机床工业，我们需要更多的钢。于是，我们就去找俄国人（因为锰矿石是靠他们那儿的克里沃罗格供应的），告诉他们：我们要增加产量。

"他们问：'干么要增产？'我们说：'建立机床工业嘛。'他们又问了：'要那个干什么？我们会卖给你们许多机床的。'我们呢——就要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巴西供应矿石，又到西方国家去采购设备。我这个大使馆的人员就在美国找卖主；但那个年代，还不是时候，美国人的那套限制办法妨碍了我们订购美国货。"

虽然这样，加拉茨工程开头还是挺顺利的。一九六〇年，这项工程才一宣布，罗马尼亚党代会上的贵宾赫鲁晓夫就表示要给予"技术援助"。建厂工作刚开始，两国的党报就为之大唱赞歌——说这是社会主义兄弟合作的光辉典范。

六十年代的头五年对苏罗关系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五年，建厂的进程反映出这种关系所经历的道路是何等曲折。一九六一年建厂伊始，俄国人保证提供一个年产三百三十万吨的钢坯厂

和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的轧钢厂和一个锻铸车间。结果只有最后一项设备算是交了货的。

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宣布今后经互会真的要一体化了。这一决定一半是对欧洲共同市场的一体化作出反应，另一半则是由于苏联认为经互会始终还停留在其原来的水平上——仍然只是集团内的一个双边贸易站。如今，该实现社会主义分工了——而根据这项分工，罗马尼亚是命该受罪的。

早在一九六一年，苏方的立场就已经有所透露了，为的是免得到时候罗马尼亚人感到突如其来，没有思想准备。但罗马尼亚人的反映却使苏联集团大为震惊：他们非但把苏联的协定搁在一边，而且去找西方国家并接受了英、法、奥和西德等国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国家承担了装备加拉茨总体企业的任务。

“在了解到我们购买了西德和奥地利的设备，又亲眼看到我们已经干了起来之后，俄国人也供应了我们一个轧钢厂。无论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兴建一个大钢铁厂，苏联如果不插上一手，是不会甘心的。”布鲁伊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我们能从克里沃罗格搞到更多的矿石了。但是，情况很微妙，随时都有断绝供应的可能。”

罗马尼亚对加拉茨危机的反应——干脆向西方去采购——是很成功的。但是事情很清楚：老是这样零敲碎打地对付俄国人，总不是个长久之计。任何政策都经常需要检讨和反复考虑，要寻求同盟者，要进行保险和再保险。在这一重新考虑的全过程中，乔治乌-德治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大师，为齐奥塞斯库此后获得成功铺平了道路。布鲁庚作为乔治乌-德治的政策顾问，也起了推动作用。

民 族 主 义

在罗马尼亚参观大学的人如果要打听那所名震一时的高尔基学院，他们肯定会失望的。一九六三年前，这所学院独立行事的情况如此严重，以致大学生们都管它叫“国中之国”。在俄语还是必修课的年月里，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岗位需要斯拉夫语专家去担任。高尔基学院就是为训练这批专家而设立的，但它只向苏联大使馆而不向大学当局负责。学院的院长不受大学校长领导，该学院学生的宿舍比一般学生要大得多，里边的家具要好得多，饭厅也比一般办得好，学院的休假宿营地又漂亮、又宽敞。高尔基学院的学生除了可以使用大学图书馆外，另外还有专用图书馆。但反之则不行。

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罗马尼亚政府把俄语必修课废止了，高尔基学院也悄悄地撤销了，教职员被吸收到其它工作岗位上去了。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和雅什大学，俄语必修课废除后，俄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生比数翻了个身——从约为五比一变成了约为一比七了。那些更换专业语种的学生往往得白白多花费整整一年的学习时间。但他们都非常乐意浪费这一年。

笔者继续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散步。首都的街道黄绿相间，景色宜人。直到本世纪初还保留着的巴尔干风格的城市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公园和林荫大道——绿，就绿在那儿；而一抹抹的金黄色，则来自一幢幢的拉毛水泥建筑——这些建筑物的设计虽属不同的时代，但在建筑上，却含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昔日的王宫及其毗邻的阿典娜神庙（一百年前，文化界的那些盛举，就是由此引入首都的），乃至今日权充学院和次要的政府机关办公楼用的那些破破烂烂的别墅，莫不体现着这一点。

《伊斯多里加》杂志社就是设在这么一幢别墅里的。这家杂志自从在六十年代民族主义高潮中创刊以来，按月向罗马尼亚人介绍本国史和世界史。在这本杂志里，苏联的作用是以罗马尼亚的观点来评定的。六十年代还出现了另一本杂志——《罗美亚》。这本以新闻报道和观点介绍为其内容的杂志办得非常出色；结果，那本罗马尼亚版的苏联《新时代》杂志只好退避三舍了。《罗美亚》是在布加勒斯特写、在布加勒斯特编、以罗马尼亚读者为对象的。可是，那个罗马尼亚版的《新时代》呢，却是莫斯科写给罗马尼亚人看的。你说其间的差别有多大！但是，《罗美亚》可不仅仅是当地爱国主义的化身而已。该杂志的一位编辑说："它扩大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我们能通过这本杂志告诉读者：他们所读到的种种事件既非只有一种说法，也不是只有一种是非观。"如果说苏联在这本杂志里倒了霉，那么美国的遭遇也同样如此。

电影也有了改良。几乎在那家巨型俄文书店从主要街道"加里亚·维多利亚"林荫大道上销声匿迹的同时，市中心区几家电影院也开始使用新名称了："五一"电影院改称为"团结"电影院；"马克辛·高尔基"电影院也叫做"高吉"电影院了。此外，在这些电影院上映的影片，内容也稍稍丰富点儿了——典型的影片包括罗马尼亚摄制的侦探片以及西方出品的爱情片和音乐片在内。

离出版宫不远，便是基舍洛夫路上那家饭店了。这家饭店很显眼，它是布加勒斯特战前的风物之一，可是十四年来它却是作为一家让俄国人专用的俱乐部而开设的。一九六三年，政府宣布：再也没有足够的理由，为了七八十个顾客，继续替这家饭店支撑门面，而大亏其本了。对此，苏联大使馆老大地不高兴。同样使苏联大使馆不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呢：党课的重点内

容，从苏共党史移到罗共党史上了。

罗共摄制的一部电影揭示了罗共党史的讲授情况。一九七一年罗共五十周年纪念日，在农民表演了舞蹈、工人高歌齐唱之后，晚会上就放映了这部电影。影片的艺术质量虽然不平衡，但它在剪接技巧上却不失为一部杰作，值得评论家拍手叫好。从二十年代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到安东尼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地下活动，丝毫没有流露出党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影响、小小的派别活动罢了。但影片编辑者的真功夫更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一直推进到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那个战役中，罗马尼亚军队被描绘成出入于战斗和胜利的场面，猛打它昔日的友军——德国鬼子。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在影片上，这一切全是罗马尼亚人自己单枪匹马地干的。影片的画面上，连一个俄国兵都没有亮过相。

影片、书店、语言教学、电影院、纪念物、杂志和建筑物——所有这一切变化，有的在罗马尼亚人看来确实意义重大，有的则对俄国人说来只会引起不快的作用。但是使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之间关系受到现实威胁的却是该时期的那个主要的民族问题，因为它涉及到领土和人民、主权和侵略。这便是比萨拉比亚的归并问题。

比萨拉比亚

这个问题可以在雅西看得一清二楚。据史册记载：不顾列强的反对，直达第聂伯河的摩尔多瓦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于一八六一年统一而成立现代的罗马尼亚时，一度曾是公国首府的雅西，就“失去了重要性”。

现代的雅西却处在一种更为严重的强权政治的旋涡之中。

在德国鬼子和苏军鏖战之后，它简直已经夷为一片平地了。如今，大片大片的草地布满了拜占廷东正教堂和大楼之间的空地。楼房的建筑是一种大刀阔斧的、罗马尼亚的大路风格——即传统的石工、彩色栋木和飞檐三者兼收并蓄的风格。就同在加拉茨那样，这儿离苏联边境只有几哩地。在这里，收到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罗马尼亚语电台同收听本地的广播一样方便。那个电台呀，据雅西的居民们说，与其说是消息的来源，不如说是气恼的来源。但有时候，那个电台也确实传来了边境战的最新消息——这场边境战在两国的报纸和电台上已经打了十年有余了。

就从近代史说起吧：一八一二年欧洲大陆上的拿破仑之乱平定后，一万七千平方哩疆土割给了沙皇。一九一九年，罗马尼亚向软弱的苏维埃国家收回了这些土地。一九四〇年，一个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则向卡罗尔国王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自动交出；之后，就占领了这片土地。一九四一年，罗马尼亚在德国的帮助下收回了失地。一九四四年苏联人又卷土重来。

一九六四年岁暮，罗马尼亚读者惊悉比萨拉比亚又成问题了——而且这回是由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原来，为了重修党史和国史，许多研究者被路远迢迢地派往国外。结果，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马恩文史资料中，历史学家安德列·鄂台泰找到了马克思未发表的著作《罗马尼亚札记》——是用几种文字写的四份手稿。以后，这些手稿译成了罗马尼亚文，经过编印出版。全部二万五千册书隔了一夜就抢购一空。

马克思对沙俄的其它攻击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往往被用来批判今日的苏联统治集团。《罗马尼亚札记》言简意明地支持了罗马尼亚人的观点：罗马尼亚的强大邻国利用实力侵占了罗

马尼亚领土，进行经济掠夺——不管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是沙皇，还是党的总书记。这里指的虽是一八一二年，但一九六四年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抵制一体化

赫鲁晓夫宏大的一体化计划，既有经济的一面，也有其领土的一面。经济方面，是要使经互会抱得更紧；而领土野心，则是企图通过一项使集团内某些地区“国际化”的计划而得到满足。由于罗马尼亚的反抗，苏联被迫修正了上述经济目标并放弃了领土目标。

罗马尼亚谋求独立自主的所有道路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一九六四年这个关系重大的年头里，这些道路更是纵横交错：第一次派遣代表团去华盛顿这一大胆行动，齐奥塞斯库的北京之行，在经互会内的初次争吵，对集团会议的第一次抵制，领土争执以及最后《罗马尼亚照会》的发布等等。这些都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一九六四年，而且相互之间先后只相差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功夫。

一九六四年四月，罗马尼亚第一次公开批评了经互会。虽然从一九五八年起，关于罗马尼亚工业化权利的争论就一直在幕后酝酿了，不过当时在党刊和经济杂志上所进行的批评还是比较含蓄。经互会执行委员会的那次莫斯科会议所争论的问题，在名义上，是扩大经互会，但是在事实上，它却是对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所宣布的一体化计划的还击。罗马尼亚人说：“在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而参加经互会的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因此，以全体社会主义国家一律参加经互会为宜。”在罗马尼亚人的观点看来，它最重要的一项目标就

是：改变经互会领导结构的组成——把让莫斯科高高在上而罗马尼亚和其它国家却被踩在底下的那一套体制一扫而光。中国、越南、古巴以及其它今后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参加，使罗马尼亚能在经互会内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找到同盟者。

莫斯科则答辩道：罗马尼亚所指责的“经互会企图使某些成员国处于从属地位”乃是一种谬论。但同时，莫斯科却又说：“社会主义各国唯有在一个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内，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发展它们的经济。”接着，莫斯科最后还留下一句专说给罗马尼亚人听的旁白：“出人意外的是，某些想各自为政的共产主义国家，竟然向资本主义国家去谋取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同经互会的争执，可说是历史悠久了，而且这部历史就连现在，也还在继续编写之中呢。它开始于一九五五年。当时，比较发达的东德和捷克等国对斯大林关于集团内每一个国家都得有自己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这一思想有所怀疑。一九五八年，他们提出了要这么干的一种方法——计划协调。在许多年里，辩论是以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进行的。

一九六二年经互会通过了《国际分工基本原则》。

必须指出：这一协议是全体成员国都签署的，罗马尼亚也不例外；当时，要设法抵制，还言之过早。该文件要求：凡国家计划，都要以各项投资都能获得最有利的机会为基础而互相协调。但文件也提出了一项保证：这个政策不应对各国的就业情况、收支平衡或国防地位有所损害。这也算是给罗马尼亚人的一点“甜头”。但非常清楚，所强调的毕竟是“协调”。最糟糕的是关于钢铁生产的决定。在罗马尼亚人听起来，这明明是专门订出来整加拉茨的：“拥有整个生产体系的冶金工厂，首先应在那些能自行解决矿石或燃料的全部或大部的国家内发展。”

罗马尼亚的官员们徘徊于愤怒和绝望之间。《基本原则》尽

管在表面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却把他们所顾虑的一切都强加到他们头上了：一体化呀，国民经济的决定权受到约束呀，可能落得个替整个集团当园丁兼采油工的结局呀。特别令人气恼的是，不但俄国人有权向罗马尼亚人发号施令，就连捷克和东德，也能同专拍师傅马屁的徒弟一样，指手划脚，要罗马尼亚吃亏而让它们自己占便宜。

在这令人难堪的时刻，赫鲁晓夫却兴致勃勃地到布加勒斯特去进行亲善访问了，为的是去说服罗马尼亚人，要他们相信苏联正在为罗马尼亚人做好事。但适得其反，赫鲁晓夫之行，帮助罗马尼亚人认识到赫鲁晓夫路线非常危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抵制。

赫鲁晓夫被领去参观罗马尼亚的工业——让他看看不发达的罗马尼亚确实在向前迈进。这项参观活动是由罗马尼亚人精心安排的，给赫鲁晓夫看了用西方机器装备起来的几家工厂。意图很清楚：即使没有苏联帮助，甚至不顾苏联反对，罗马尼亚的工业化反正总是要搞下去的。

赫鲁晓夫显然是回避了第一批建筑物和塔楼正在那里渐渐升高的加拉茨工地。如果他去了，就得对这项工程表态：赞同或责难。但是，当他去克拉约瓦郊区参观电机厂时，也并不见得称心愉快多少，因为这家厂也是使用进口的机器和工艺。

布鲁庚说："赫鲁晓夫是不想要我们这么干的。他参观克拉约瓦一家我们引以自豪的机车厂时，我也在场。那家厂是根据瑞士厂商的特许而进行生产的。赫鲁晓夫质问乔治乌-德治说：'这种机车我们也没有，你们要它干么？'他还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并不需要这些工厂。'

"一群工人捧着礼物（该厂的模型）迎接赫鲁晓夫。显然，工人们为这个模型辛苦了好一阵了，而且也为此感到自豪。可是，

赫鲁晓夫却背转身去，拒不接受这个礼物。工人们受到了他的羞辱。他对自力更生的小国，一向是要这种态度的。我们可不接受这份羞辱。”

罗马尼亚竭尽其能、全力以赴地利用尚能掌握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从而对这种羞辱作出了反应。在头几年，罗马尼亚一般只是不派高级官员去参加集团会议，却并不完全抵制这种会议。整个集团内唯有罗马尼亚发表了中国驳斥苏联的论点；但它所发表的只是大意，而且特别强调的，也是同罗马尼亚对经互会的观点一致的那些中国的观点。

但是，《罗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宣言》的发表，却是大张旗鼓的。这个后来在布加勒斯特和国外都被称作《独立宣言》的文件，包括的面虽然很广，但一再提到的却是经互会和民族权利的丧失问题。它声称：“全体经互会成员国只能有一个单一的计划机构这一构想，不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后患无穷的。按计划管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基本的、实质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属性之一……如果把这种职能划归凌驾于国家之上或超越于国家之外的机构，那末，‘主权’势必沦为一个无聊的概念。”

《宣言》在莫斯科所引起的这场震惊，同数月之后苏联一项计划在布加勒斯特所引起的那场震惊不相上下。看来，苏联的计划恰恰就是为了成立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所担心的那个超国家而制订的。这项计划是由一位地理学家透露的，它同利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推行国际经济合作有关。И·В·瓦列夫写道：苏、罗、保有的是劳动力和原料，只要利用克里沃罗格的铁矿石、利用包括加拉茨在内的三国的不同的工厂，就能对共同解决有关问题有所帮助。但是，如果拟议中的经济区要真正发挥作用，三国间的现有边界就不能再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每一个国

家都必须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这个情况，罗马尼亚人是从罗共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义愤填膺的论文中获悉的。文中写道：竟然要罗马尼亚放弃有百分之四十八人民在那里生活的、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边区'这个词儿没有被滥用吗？如果有人回答，说苏联和保加利亚也拿出地来的；那末，在十五万平方公里中罗马尼亚要分担百分之六十七，而保加利亚和苏联却只要各分担三万八千平方公里和一万二千平方公里。

这一地区将成为无人之地而不再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了，好象为了什么所谓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连国界也可以侵犯了。如果这些计划一旦实现，那末，罗马尼亚国家和罗马尼亚民族势必要在"经济必需"的幌子下，以被简单化的马列主义的名义，被简单的行政手段所消灭掉。

莫斯科立即意识到这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很快就让这个试探气球泄掉气；而瓦列夫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科学观点"。

布鲁庚说："甚至超级大国，它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象越南那样的一个小国和穷国，也能赶走技术上高超得多的美国。这一事实是有其后果的。苏联在世界这一地区虽然幅员广大，实力雄厚，却同样也是有限得很。小国必须斗争，而十多年来罗马尼亚一直坚持的，也正是这个。"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美国出版的《苏维埃欧洲》一书　陈中绳译）

蒙哥马利：阿拉曼战役的传奇式人物

〔美〕《时代》周刊

曾有人问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大名将是谁？他含笑地回答说："另外两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

这话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倔强、自信和傲慢。当八十八岁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上周在英国汉普郡逝世时，专家们却几乎都同意他对自己所作的评价。历史学家A·J·P·泰勒认为蒙哥马利是"继威灵顿之后，英国最优秀的陆军将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性格鲁莽、身躯矮小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上司，也作过下述评论："在赢得部属的高度赞赏和在打仗的周密计划方面，蒙哥马利是首屈一指的。"也有人称他是一个被过高地评价了的、缺乏想象力的将军，是一个喜刁难、爱吵闹的人。但是，不管最终会对他的功绩作怎样的评价，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将领中，赢得的声望和赞扬能超出这位阿拉曼战役胜利者和率领英军从诺曼底挺进到波罗的海的领袖的，可是寥寥无几啊。

没有人比蒙哥马利自己更努力于散播有关他自己的传奇式的历史。从他早年的、享受不到温暖的童年生活起，他追求的出路就是通过当领袖来支配别人——最初是在运动场上，之后是在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不屈不挠的自信心，以及他自我吹嘘的本领，提高了英军的士气，而这在当时是很需要

的。他那出名的贝雷军帽，邋遢的高领衣服，以及他突出的颚部，妙语连篇地对事务主义表示不耐烦的劲头，已成为盟国打仗时坚韧不拔地要完成任务的精神的国际象征了。

蒙哥马利一八八七年生于伦敦的肯宁敦区。他的父亲是这个区的牧师。他的军人生涯是在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开始的，为了点火烧同伴的一件衬衣，他差点儿要被逐出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服役三年之后，他在马恩河一带作战，在比利时的伊帕尔地方身负重伤。他三十岁那一年，在战火纷飞中被提升为陆军中校。之后，他相继在印度和中东服役。一九三八年晋升为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法、比两国相继土崩瓦解，在敦刻尔克大溃退中，他泰然自若地指挥一个师，几乎完整无损地撤了出来，于是他的声望得到了提高。

蒙哥马利是在北非阿拉曼战役后成为民族英雄的。顿时，他的才能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争论不休。蒙哥马利率领久战沙场的英军第八军团，在一次攻势中把自吹自擂为“沙漠之狐”的德国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非洲部队逐出埃及，使它一直撤退到突尼斯。在那里德国人又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率领的北非美军的截击。阿拉曼战役使英国举国欢腾。温斯顿·邱吉尔就这一著名的战役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一战役之前，我们没有一次打过胜仗，在这一战役之后，我们再没有打过败仗。”虽然阿拉曼之战无疑是这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但蒙哥马利赢得的声誉也许是远超过了他所应得到的。这位英国指挥官执行作战方案时确实是考虑周密，注意一切细节的；但是许多分析家却深信，英国取得的胜利显然应归功于英军比敌人拥有优势的人力和武器，而不是蒙哥马利的战略才能。经过煞费苦心地准备就绪的进攻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揭开时，蒙哥马利拥有二十三万名士兵和一千一百辆坦克，而隆美尔部队仅有八万名士兵和

二百六十辆坦克。但这一仗打下来的结果是，英国遭受的损失是敌人的三倍。

阿拉曼战役具体体现了蒙哥马利的作战风格：长时期地、审慎地积蓄作战物资，然后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并辅之以侧翼的攻击。这种战术多次取得了胜利，如在突尼斯的马雷特、意大利的桑格鲁河以及法国的卡昂。但也有导致灾难的场合，比如：一九四四年以代号"菜园"为名的一次不幸的战役，就是最为突出的一次灾难。按照蒙哥马利的作战方案，他要先夺取荷兰境内来因河上的五座桥，以便大军能直指德国鲁尔区。在关键性的阿纳姆一仗中，英美军队惨败，从而使这次进军宣告完蛋。

后来，蒙哥马利不得不承认他"在阿纳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当时，他却把这场灾难归咎于艾森豪威尔，指责这位美军司令没有能向蒙哥马利的军队提供足够的军用物资。事实是，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蒙哥马利同盟军司令部美国指挥官之间的大吵大闹从未停止过。这一场战争中的战争愈演愈烈，以致艾森豪威尔威胁要把蒙哥马利调走。蒙哥马利后来说："艾克缺乏经验，很不称职，他是一个极不高明的战地指挥官。"

显而易见，蒙哥马利是有其缺点的，但他在英国远非仅仅占有了一个将军的地位。他是一个同辉煌的英帝国开始没落一事连在一起的人物，是超级大国崛起后英国军事力量黯然失色之前打过最后一系列胜仗的那个人。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写道："后世未必会认为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将军的。"但在普通人们的心目中，这位阿拉曼战役英雄如不能同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并列，但至少也能同马尔巴勒和威灵顿相提并论。对此，甚至蒙哥马利自己也许会欣然同意，认为置身于这些军人之列也是不辱没自己的。

（译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美国《时代》周刊　高立育译）

俄国式的缓和

〔法〕让-弗朗索瓦·勒韦尔

西欧人从苏共二十五大中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勃列日涅夫报告中所宣布的政策会对西欧产生什么后果呢？

苏共中央总书记照本宣读的冗长报告包含了四个问题。

第一，苏联得意洋洋地表明了自己军事实力的奇异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全世界的扩张。如果从兵力、火炮、坦克、军舰，特别是潜水艇和原子弹的数量来看，苏联大大超过了美国，也压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微弱的军事实力。目前，美国仅仅在空中还保持着明显的优势。

苏联的军事优势还得到外交优势的帮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随心所欲地退出这个机构，象现在已经退出的和将要退出的法国、希腊、土耳其、葡萄牙，甚至还有荷兰那样。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他们之间还会相互交战，如希腊和土耳其。相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它们在相互之间以及和苏联的盟国之间，就没有这样的行动自由了。

例如，小小的冰岛就宣称，如果在解决使它同英国对立的鳕鱼之战中对它不利，就将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人们不能想象捷克斯洛伐克会就随便什么使它同匈牙利对立的鲤鱼战或者梭鱼战，而谈论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然而，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们的眼里，苏联在全球的军事扩张远不是帝国主义行为；恰恰相

反，是为了保卫和平。只有反对苏联的军事扩张即社会主义输出的人才是和平的真正敌人。

所以，每当西欧要求加强防御力量的呼声不断上升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恼火，并提出抗议，而且这种抗议通常总是奏效的。根据他们的观点，西欧防御力量的加强是一种挑衅性的行为，因此苏联也应该不断增长他们的军费开支。

第二个问题讲的是“缓和”，这同苏共二十五大的第一个内容有着逻辑联系。缓和对勃列日涅夫先生说来，首先意味着西欧不仅仅要放弃军事反措施，而且要放弃对苏联的所有抨击。法国总理在最近一次广播讲话中，否定了列昂尼特·普里乌钦和其他政治避难者批评苏联的权利。如果说，西欧共产党对莫斯科的顺从开始减少的话，那末这种顺从已经被资产阶级政府所代替，并且在不断扩大。相反，苏联攻击西欧制度的权利，却一点也没当回事而被提出来。对于莫斯科说来，西欧在意识形态上的裁军也应该如同称为“集团同时消失”的军事裁军一样是单方面的。虽然上述的同时消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几乎没有出现过。

在缓和中，苏联最感兴趣的就是经济。在他们看来，西欧只有对苏联经济的各消费部门继续支持和援助，才是忠诚于“缓和精神”，这样也能使苏联间接地节省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以供给它的军事支出。

勃列日涅夫报告的第三部分……删去了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所作的揭露斯大林极端恐怖的报告的内容。正如勃朗哥·拉齐兹最近所写的一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随着年月的消逝而渐渐地销声匿迹，被历史所抛弃。书中还指出，共产党国家的“自由化”永远不能超出某一点，即不能危及整个社会制度本身。由于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各打五十大板，所以他的报告

事实上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警告和加强警察控制的信号。

至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的第四个主要问题，也是最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西方共产党走“民族化”和“民主化”道路问题。苏联把这种方向斥责为“机会主义”。这里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和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定意味着尊重民主。北京、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地拉那虽明显地全部或部分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并没有由此而带来多党民主制和政治的自由化。

此外，法国共产党自称是“法国式的共产主义”，但它忠实地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在亚洲或非洲的哪怕是最细节方面的扩张。从长远来看，乔治·马歇戏剧性地未出席莫斯科的代表大会比起不帮助苏联反对西欧一体化来说，就没有什么重要性，对苏联也没有什么损害。贝林格虽然出席了莫斯科会议，但从根本上说，他更有一些独立性，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不反对西欧一体化。

所以，在美国或迟或早但又必不可免地撤出西欧，从而在西欧不折不扣地出现政治、军事真空的同时，法共的“民族化政策”尽管从某一方面使莫斯科感到恼火，但在其它方面，是否对苏联没有益呢？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到七日法国《快报》周刊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二年级法语班工农兵学员译）